



第 35 期（总 35 期）
教学管理办公室编制

目 录

■ 新闻动态

曹文轩教授与校领导会面并接受媒体联合采访	4
话剧《雨花台》首都高校专场演出在北大举行	5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举办第二届首都高校社会学学生论坛	6
孙祁祥出席 2016 “天下女人国际论坛” 并发表主旨演讲	9
北京大学举行清明公祭活动	10
经院国家资源经济研究中心发布“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指数”	12
北大乒乓球世界冠军刘伟在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宣讲	15
北京大学代表团参加中以大学校长论坛并访问以色列高校	16
日本 21 世纪论坛中日研修团访问北大国际关系学院	18
第四届北京国际淋巴瘤研讨会召开	20

■ 网教之声

第一门完全在线课程诞生三十周年	23
教育信息化改革中国教育资源格局	26

■ 北大人物

温儒敏：五院人物	29
蒋绍愚：我的自述	35

■ 学者谈读书

为什么要读王小波 ----- 51

书，我们的避难所 ----- 54

■ 好文共赏

季羨林自传(下) ----- 56

■ 史苑钩沉

北大无北门 ----- 62

■ 大美北大

樱花 ----- 65

■ 学员心声

感谢有你 ----- 66

编辑寄语

一位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在 19 年前的四月离开我们。从此每年四月，人们总会想起王小波，纪念王小波，这成为一代读书人的重要仪式。本期学者谈读书栏目选了一篇文章，专门从长于说理的角度去评论王小波，以此作为本期燕园网讯的特别推荐。

祝愿每一个人春天多读书！

主办：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承办：教学管理办公室

编委会组成：

主编：关海庭、张虹

副主编：杨虎、常靖

执行副主编：王凝、杨雯宇、吴晓风、

编委会成员：肖志欣、曾玉芬、郑鹂、杨舒婷、刘晴晴、石传芬、唐海峰、孙叶敏、王帅、王迎春、王姗姗、林以晴、高前余、张翼、吴丹、王凯惠、徐燕、张凯、赵晓玲、白永花、司敏、李文文

新闻动态

曹文轩教授与校领导会面并接受媒体联合采访

4月11日下午，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在英杰交流中心贵宾室亲切会见了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得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曹文轩。

林建华对曹文轩获得这一世界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表示由衷的祝贺。他说，此次获奖实现了中国作家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同时也是对曹文轩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所作出贡献的肯定，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水平得到了世界层次的认可，是中国文化实力的体现。



林建华会见曹文轩

曹文轩简要介绍了国际安徒生奖项及评奖过程。他表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世界更多地关注中国。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文学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他的作品讲述了只能发生

在中国的中国故事，但故事的主题寓意可以在世界范围产生共鸣。

林建华表示，此次获奖对学校是一件喜事，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人才济济，近年来中文系在多个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教师们付出了大量心血，当代文学直面当今时代发展潮流，它的发展对世界了解中国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林建华指出，人文学科是北大的根基，要保证其领先地位和优势，学校将进一步推进人文学科建设。他也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涌现出以北大为题材的优秀长篇小说作品。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社会科学部部长王博，党委宣传部部长蒋朗朗，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陈跃红、党委书记金永兵等参加上述活动。

会见结束后，曹文轩接受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北京晚报等媒体的联合采访。

曹文轩感谢媒体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说，中国作家具有得天独厚的创作优势，有大量的中国故事素材等待创

作挖掘。他认为中国的语文教材还存在一些不足，在激发想象力和自由精神方面还有所欠缺，即将启用的新版语文教材将在这些方面得到改进和加强。对于即将到来的“世界读书日”，曹文轩表示，阅读对于国家和民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从国民的阅读抓起。

今年 8 月，曹文轩将前往新西兰领取国际安徒生奖，据他透露届时他近期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也将问世。（文/姜南）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未天

话剧《雨花台》首都高校专场演出在北大举行

4 月 4 日，由中宣部、教育部共同主办的原创大型史诗话剧《雨花台》全国高校巡演活动在北京大学正式启动。4 月 6 日下午，《雨花台》剧组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为首都高校大学生带来一场专场演出。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委员、教育纪工委书记王文生，南京市委宣传部分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曹劲松，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叶静漪，以及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姜恩来，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戚德祥，北京城市学院校党委委员、校工会主席庞东辉等领导与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 13 所高校近 1200 名大学生一同观看了演出。

演出开始前，在工作人员的带领和讲解下，来自 13 所高校的大学生参观了在百周年纪念讲堂大厅举行的雨花英烈事

迹展。雨花英烈事迹展展现了从 1927 年至南京解放时期，牺牲在南京雨花台的恽代英、邓中夏、施滉等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

话剧开演前，王文生代表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向领导、来宾和同学们表示热烈欢迎，并向《雨花台》全体演职人员表示衷心感谢。王文生说，雨花台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最集中的殉难地，在这里无数英雄儿女慨然赴死，壮烈牺牲，捍卫了自己的信仰。如今的雨花台是充满红色基因、激荡浩然正气的英雄圣洁之地。2014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指出，在雨花台留下姓名的烈士就有 1519 名，他们的事迹展示了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话剧《雨花台》以雨花台多位烈士真实事迹为原型创作，

是献给当代青年的一场精神盛宴,演出必将引起大学生的强烈反响与共鸣。王文生希望同学们在观看话剧的过程中多思考、多体会,将雨花英烈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他鼓励同学们缅怀先烈,肩负起首都大学生的责任与使命,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刻苦学习,埋头苦干,以实际行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自己的新贡献。

话剧《雨花台》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的某一天,在南京雨花台附近一座阴冷的监狱中,被捕的共产党人与国民党进行着一场不见硝烟的生死之战。面对国民党审讯者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监狱中的共产党人咬紧牙关、坚守立场,在与敌人沉着冷静周旋时巧妙机智地送出了宝贵的情报。

两个小时的精彩演出在激昂悲壮的国际歌旋律中结束,现场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北大学生代表走上舞台向主创及演

职人员献花,现场的领导和嘉宾也来到台上与大家合影留念。



嘉宾与演职人员合影留念

此次演出是话剧《雨花台》继4月4日、5日在北大两场成功演出后的第三场。演出受到各位领导、来宾以及首都各高校学生的一致好评。(文/新闻网记者王岩)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山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举办第二届首都高校社会学学生论坛

4月9日至10日,北京大学第十二届社会学文化节暨第二届首都高校社会学学生论坛成功举行。该论坛是由北京八所高校于2015年联合发起,旨在凝聚社会学青年的学生学术交流活动。本届

论坛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以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学相关院系协办。论坛分为开幕式、系列分

论坛、社会学辩论赛以及闭幕式四个环节，吸引了来自八所学校社会学院（系）的近 300 位老师和同学参与。

本次论坛以“从实求知”为主题，语出费孝通先生晚年作品集《从实求知录》，所谓“从实”即扎根生活，从实际出发观察与发现问题，而所谓“求知”，则是对从实际之中获得的材料的分析和升华，以把握其中真理。以此为本届论坛的主题，一则是感前人教诲之德，聊表后辈晚生之追念；二则是勉励所有参加本次论坛的学生努力学习前辈的学术精神和学术理念，立足本土，从实求知。



开幕式与会嘉宾合影

本次论坛于 9 日上午顺利开幕，继致辞、上届论坛回顾环节后，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应星教授进行了题为“社会学经验研究的方法论反思”的精彩讲座。应星强调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社会学是为了扭转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的滥用、试图弥补乡村口述史研究的局

限，对其方法进行反思、开辟中国革命的社会学研究之路任重而道远。



北京大学教师代表周飞舟教授致欢迎辞



中国政法大学应星教授讲座现场

4 月 9 日下午，“城乡发展与城乡融合”“社会互动与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组织与社会管理”三场主题分论坛同时举行，八校师生就同学们带来的《农转非、教育回报与新旧市民不平等》《市场转型中的身份、劳动与单位——当代中国城镇居民的相对剥夺感》《风险与正义：中国语境下邻避设施的空间分布研究——以北京市为例》《社区失落还是社区解放：传统老旧小区邻里关系变迁——

以北京大栅栏街道为例》《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年龄组的差异性分析》《非政府组织在社区营造中的参与—以台湾八烟社区为例》《城市流动摊贩的公共空间占用—以北京市海淀区天桥流动摊贩为例》等 18 篇学术论文展开了分享与讨论。在交流中，社会学青年们思维激烈碰撞、相互融合、共同进步，展现了当代社会学人的别样风采。从作品中体现出的同学们对社会问题的敏锐与社会责任的担当受到了在场老师们的一致好评。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梁维聪在论坛上介绍自己的研究

4月10日，来自北京工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

六支辩论队两两一组，就“朋友圈该不该屏蔽导师”“中国女性地位目前趋于上升还是下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进击还是逃避”三个辩题展开辩论。辩手们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思维，在激烈的辩论中进行了语言的切磋和思想的交流。三场论辩结束后，本次论坛于4月10日下午圆满落下帷幕。

本次论坛中，社会学青年们循着前辈们的足迹，探索着中国社会学之未来。八校社会学学生将把对乡土文化研究的热情和思考延续下去，怀着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立足本土，心系家国，从实求知，不负韶华。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山石

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出席

2016“天下女人国际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日前，“天下女人国际论坛”在北京圆满落幕，本届论坛的议题为“包容的社会，真正的伙伴”（Inclusive Society True Partnership），众多行业内颇有建树的嘉宾及全国各地数百位优秀女性共襄盛举，探讨在日趋包容的社会下，重新认知伙伴关系，为实现女性与男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知识与方法。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孟晓驷，澳大利亚第26任总理陆克文，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办公室全球事务高级顾问 Vishakha Desai，阳光媒体集团主席、知名媒体人杨澜同台发表主旨演讲。

孙祁祥在题为“女性成长中的‘她’与‘他’”的主旨演讲中讲述了她对女性价值的理解，并从劳动分工与性别角色相关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第一，产业结构从以传统制造业、农业为主向高端制造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转变；第二，要素的集约程度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转变；第三，劳动方式从体力劳动为主向智力劳动

为主转变；第四，供求范式从生产者主权向消费者主权转变；第五，经济形态从实体经济为主向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并存转变；第六，社会的联系从传统的通讯方式向网络空间转变。她认为，由于上述转型，相对传统社会来说，现代社会的分工依据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农业社会之所以有“男耕女织”的劳动分工，是因为这种分工能够很好地适应男女生理上和体力上的要求。在发生了上述转变之后，许多领域和工种对体力和生理方面的要求就会大大降低，性别的约束也由此大大降低，可以说，这个时候，由悟性、个性、毅力、勤奋等智商、情商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结果会大于性别差异所导致的结果。不仅如此，上述转型使得妇女的价值和力量得到更加有力的释放。

最后，孙祁祥用“ABC”即 Appreciation, Binding, Collaboration 高度概括了两性伙伴关系。她指出：“在这个社会上，男人和女人只有相互欣赏、相互依靠、相互合作，才能共襄大计、共度难关，才能共

同进步、共同成长。”孙祁祥的演讲赢得了在场嘉宾和观众的热烈反响及高度赞许。



孙祁祥发表主旨演讲

由知名媒体人杨澜女士发起、阳光媒体集团主办的高规格颁奖典礼——“女性创造力奖”盛典，每年定期在“天下女人国际论坛”期间举行，旨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出中国女性的形象，讲述她们的故事，以表彰正影响着中国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的“她力量”。孙祁祥荣获2016年“女性创造力奖”。在随后发表的获奖感言中，孙祁祥表示：“组委会给我这份殊荣，应当是对我从事教书育人这项神圣

事业的一个高度认可，但我更愿意把它看做是一个鞭策、一个激励。”



孙祁祥荣获2016年“女性创造力奖”并发表获奖感言

同时获此殊荣的还包括雕塑艺术家向京，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创始人王奕鸥，导演、编剧李玉，歌唱家、中国新艺术音乐创始人龚琳娜，自由式滑雪世界冠军、北京申冬奥形象大使李妮娜，全国工商联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刘亭，以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导演李少红。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北京大学举行清明公祭活动

4月4日早晨8时，伴随着熹微的晨光，北京大学领导和师生代表们来到静园北大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举行清明公祭活动。师生们手持黄白菊花，低首默哀，向

为新中国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们表达无比崇敬和深切缅怀之情。

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叶静漪，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曹劲松，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主任郭海,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严纯华,北京大学团委书记陈永利,话剧《雨花台》编剧高城教授及主要演员崔钟、张树平等,以及北京大学共青团系统教职工代表和学生代表两百余人参加了公祭活动。



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中,在中国共青团团旗和北京大学校旗的映衬下,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显得庄严肃穆。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北大师生代表们向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北大革命先辈们默哀致敬。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建成于1993年5月4日,主要纪念的是从“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直至抗美援朝,北京大学的师生校友中牺牲的96位革命烈士。纪念碑的正面是老一代革命家陈云同志的题词“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背面碑文记录着96位革命烈士,第一位就是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

默哀后,青年学生代表朗诵了缅怀革命先辈的原创诗篇——《青松礼赞》。“莫再说彼时满目疮痍,镰刀锋利,斧头拿起,九十年前的盘古正在开辟出一片新天地!”饱含深情的朗诵,让人回忆起如青松一般刚毅卓绝的革命先烈用生命和信仰书写的光荣历史。百余年来,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光荣传统的激励下,一代代北大青年前赴后继,与民族同呼吸、与国家共命运。

活动现场,学生代表朗诵了由南京市委宣传部出品、南京市话剧团演出的原创话剧《雨花台》中的节选,该选段为共产党员恽代英与张良诚在狱中慷慨赴死前的一段对话。雨花台位于南京城中华门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圣地,从1927年至南京解放期间,雨花台成了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最集中的殉难地。无数优秀中华儿女慷慨赴死,用鲜血和生命铺就了新中国的诞生之路。为了缅怀革命先驱、弘扬雨花英烈精神,今年4月,《雨花台》将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巡回演出。

随后,学生代表朗诵了邓中夏同志诗选。革命岁月里,共有96位北大英烈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地贡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邓中夏就是其中的一位。“哪有斩不除的荆棘?哪有打不死的豺虎?哪有推不翻的山岳?你只须奋斗着,猛勇地

奋斗着；持续着，永远地持续着。胜利就是你的了！”铿锵话语中展现出一位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钢铁意志。

随后，林建华、叶静漪等向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了花篮。挽联整理后，全体师生面向革命烈士纪念碑鞠躬三次，并依次敬献鲜花并逆时针环绕一周，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



师生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

活动最后，师生们还向中国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北京大学原校长蔡元培的雕像前祭奠并依次献花致敬。（文/高雷）



师生向蔡元培雕像献花致敬

摄影：李香花

编辑：白杨

北大经济学院国家资源经济研究中心发布首个

“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指数”

2016年4月9日下午2时，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家资源经济研究中心构建的“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指数”正式发布，会议同期发布新书《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指数——各地级市转型评价》。这是首部关注全国性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研究成果，也是首次以转型评价为切入点研究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的理论探索。这一研究将建立起研究资源型城市

的新方法、新思路，有助于全面把握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特点、难点以及制约和促进转型的主要因素，为未来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科学指导，促进学术研究与实践发展的互动，更好地发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家资源经济研究中心作为“智库”服务政府、社会和产业发展的综合功能。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

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祖等国家部委相关部门研究机构、高校的专家学者应邀参加了本次会议。

对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家资源经济研究中心这次既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又具有理论价值的开创性探索，与会专家领导纷纷表示认可，指出这一研究十分具有意义，相信未来在引导资源型城市转型时将发挥重要作用，并希望这项研究工作能够持续进行下去，通过不断完善建立起在城市转型、产业转型、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影响力。刘伟教授肯定了该书作者、国家资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虹教授及研究团队为此付出的大量辛苦劳动，指出这个研究要强调与地方发展的实际相结合，要尽快完成对地方的调研，来进一步明确问题产生的根源。辜胜祖先生、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先生分别从契合国家顶层设计、结合当前热点问题，如国有企业改革等角度，进一步强化指标体系与国家大政方针相契合，更好地展现和服务现实需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先生认为研究应当逐年推荐，不断发展问题，总结经验和教训，发挥对城市转型实践的指导作用。另外，其他多位与会学者都提出未来研究要加强与资源型城市发展实际的结

合，在实践调研中不断完善指标体系，更好地发挥其对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

作为城市转型系列研究的开篇之作，此次推出的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评价指数重点关注城市转型能力和效果，通过运用指数对中国 115 个资源型城市转型进行综合评价，客观还原、呈现当前时间节点上我国地级资源型城市在探索转型中所面临的共性、特性、内外部问题，并结合城市发展实际深入分析影响转型的主要因素，以此为依据提出下一步转型的突破口或发力点。从评价结果看，综合转型指数位列前十位的分别是：包头、三明、铜陵、湖州、池州、乌海、龙岩、南平、韶关、广元。其中，包头、铜陵、湖州、池州、南平等地在经济、社会、环境、制度转型的分项转型指数均排名靠前，各项转型效果较好，而七台河、广安、鞍山、陇南等地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环境转型、制度转型指数分配排在全国末位。

此次研究的最大特色表现在资源型城市转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指标的选择方面。在指标体系的构建方面，结合发展问题和转型目标提出了“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环境转型”“制度转型”4 个一级指标，10 个二级指标，46 个三级指标，构建起立体化的中国资源型城

市转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指标的选择方面，体现了三个层面的重点考量和安排：第一，为准确反映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核心问题，即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本书将资源型产业界定为“采掘业”（对资源的直接开采），比例越大说明经济发展对资源依赖程度越高；第二，借鉴国内外评估城市转型的主流方法，综合考虑转型效果和转型能力，本书重视“劳动力结构”，考虑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和年龄分布，尤其是年龄分布，反映了城市经济的活力；第三，与西方国家市场主导的城市转型不一样，政府在我国城市转型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功能。本书重视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制度支撑，从政府效率、市场效率两方面评估制度转型效果。

正是基于这种开创性的探索，本书发现了以往研究未能提炼出的、具有较高实践指导价值的结论，包括：第一，发现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经济、社会、环境转型之间未实现同步、协调发展，未建立起彼此促进、共同推进整体转型的内在机制；第二，指数排名靠前的城市在地理上具有比较明显的地区集聚现象，突出了转型效果典型地区的周边辐

射和带动作用；第三，解决好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有助于促进资源型城市的社会转型，是实现成本较低的社会转型路径；第四，当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两者同步推进时，对环境转型的促进作用最大；第五，中央财政资金的支持在推动资源型城市，尤其是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社会转型方面的作用显著；第六，对于不同发展类型的资源型城市来说，成长型、再生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效果好，但预期不符的是环境转型和制度转型指数普遍偏低，影响了总体转型效果；多数衰退型城市的经济转型落后于其余三类城市，若不尽快实施有效转型战略，城市转型将持续陷入困境；成熟型城市的未来转型更应当强调经济、社会、资源的同步推进。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家资源经济研究中心将持续关注资源型城市转型及评价，并陆续推出有关资源型城市转型压力、转型能力、转型路径等系列研究成果，未来还会把评价对象扩展至所有城市，形成有关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系列成果。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北大乒乓球世界冠军刘伟在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宣讲

4月6日下午两点，“享受乒乓生活，共赴健康之约：中国国球乒乓球宣讲互动会”在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多功能厅举行，北京大学乒乓球世界冠军刘伟女士应邀作为主讲嘉宾参加活动。开罗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林小英教授和外方院长李哈布教授、人民日报中东总分社社长刘水明先生、旅埃汉语教师、留学生以及孔子学院的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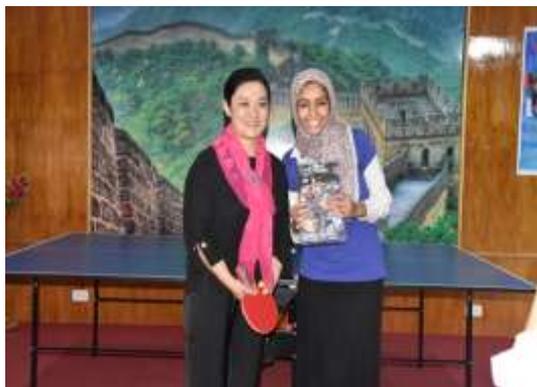
宣讲现场

此次宣讲互动会由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和中文系主办。2016年年初，开罗大学孔子学院中外方院长共同拟定包括中阿研究、中国诗词、中国体育在内的10个重大项目，并得到了刘延东副总理以及中国国家汉办的充分肯定。中国国球乒乓球宣讲互动会的举办正式拉开了开罗大学孔子学院2016年重大项目的序幕。



刘伟展示球技

刘伟分别从乒乓外交、人生感悟、乒乓精神等方面介绍了自己职业运动员生涯以及学习生涯的感悟经历，激励大家做最好的自己。刘伟的人生感悟主要包括志存高远、苦之历练、胜利之匙、面对失败四个方面，而乒乓精神就是不服输、不怕输、永不言败的韧劲。她鼓励孔子学院的学生在学生汉语的过程中也要有这种追求卓越、不断超越的冲劲。刘伟的职业运动员生涯有16年，求学之路又是16年。在谈到下一个16年时，刘伟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那就是以开罗大学孔子学院为首站开启她的全球巡回演讲，继续致力于乒乓球事业的发展。



刘伟与现场观众互动合影

4月7日上午10点，刘伟在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十月六日城中埃友好示范学

校教学点举办第二场中国国球乒乓球宣讲互动会。同时，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将

以此次宣讲会为契机，计划在2016年下半年举办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第一届乒乓球比赛，旨在加深埃及学生对国球的了解，培养埃及学生学习乒乓球技术的兴趣，助力中埃文化年体育人文交流。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北京大学代表团参加中以大学校长论坛并访问以色列高校

3月28日-31日，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率领代表团出席在以色列耶路撒冷举行的首届中以大学校长论坛，并顺访了希伯来大学、特拉维夫大学、以色列理工学院等伙伴高校，进一步加强了北京大学与以色列重点高校的深度交流与合作。



刘延东携各部委领导与参加首届中以大学校长论坛的中以高校校长合影

3月29日，中以大学校长论坛以“中以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为主题，由“中以7+7研究型大学联盟”成员高校发起，邀请了两国众多高校参会。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刘延东希望两国大学互学互鉴，做服务两国关系、增进人民友谊的引领者。作为论坛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中国古典名著》希伯来语版发行仪式一同举行。仪式上，刘延东向以色列教育部长贝内特赠送了北大《中国古典名著》希伯来语版代表作——《论语》和《红楼梦》。林建华和希伯来大学校长本萨

松作为合作方代表共同见证了赠书仪式。由北京大学与希伯来大学合办的希伯来孔子学院，近年来精心策划并支持以色列汉学家陆续将中国古典名著翻译为希伯来语。此次《中国古典名著》希伯来语版译著的出版发行，向以色列学界及社会生动介绍了中国优秀古典文化，有力地推动了中以人文交流。



林建华和本萨松作为合作方代表共同见证赠书仪式

当天，林建华还专门拜会了本萨松，双方表示希望在现有孔子学院、数学研究以及学生交流项目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全面交流合作，并着重商谈了在脑科学方面合作的意向，本萨松希望将来能与北京大学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



林建华向本萨松赠送北大纪念品

3月28日，林建华还率团访问了特拉维夫大学，拜会了校长克拉夫特。代表团详细了解了特拉维夫大学在商业创新教育、纳米医学、食品安全、东亚研究、国际交流等领域的最新进展。林建华及代表团成员也向特拉维夫大学介绍了北大的相关情况。北大农学院（筹）与特拉维夫大学粮食安全中心不久前签署了两校合作建立粮食安全联合中心的备忘录，该中心将致力于引入以色列创新农业领域的成熟技术和商业实践，与中国日益增强的技术能力相结合，通过产业和学术对话，推动两校以及中以两国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同时两校也将在人文社科、生命科学、创新创业等领域探索更多合作可能。



林建华一行访问特拉维夫大学

3月30日，代表团一行访问了以色列理工学院，拜会了院长拉维。代表团与该校技术转移公司首席执行官、知识创新中心主任、勃朗尼卡创业中心主任等人进行了座谈，详细了解了以色列理工学院在美国纽约和中国汕头校区的相关情况，双方希望相互借鉴以便推动大学科研成果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创造更大价值。



林建华与拉维等座谈

访问以色列理工学院期间，林建华还拜会了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丹尼尔·谢赫曼教授，双方就化学、生命科学、工程科学等方面合作的可能性进行了深入探讨。



林建华拜会丹尼尔·谢赫曼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江南

日本 21 世纪论坛中日研修团访问北大国际关系学院

2016年3月21日上午，日本21世纪论坛（梅下村塾）第29期中日研修团

访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学院专家学者交流。中日研修团包括9名来自

日本企业界、新闻媒体及日本政府的成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主持交流活动，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教授，学院梁云祥教授、王栋副教授出席活动并发言。

双方就中日关系、中国外交政策、中美关系、海洋政策、中日政治与社会问题等展开对话。

贾庆国教授对研修团的来访表示欢迎，并发表了对当前中美关系的看法。贾庆国提出，中美近期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论使得国际舆论对中美关系普遍持较为悲观的看法。事实上，这种判断是片面的、不准确的。他强调，我们需要全面客观分析中美关系，中美相互依赖的关系广泛存在于不同领域，两国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不断扩大，比如中美在气候变化、朝鲜半岛危机等问题上的沟通与合作反映了两国关系的两面性。外部世界需要理解的是，中国快速崛起得益于现存国际秩序，中国不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而是维护者。

梁云祥教授就中国如何看待中日关系近年来的发展发表了看法。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日关系开始进入全新时期，安全困境开始困扰中日关系，中日实力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

由于缺乏互信，两国冲突加剧，国民间好感度也开始大幅下降。在上述变化的影响下，2012年中日爆发钓鱼岛争端，中日间一系列争端公开化，两国关系急转直下。2014年底APEC峰会期间中日领导人会面，使得中日关系继续恶化的趋势基本得到遏制。

王勇教授介绍了中国对外关系新理念与新变化。他提出，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相对应，中国政治与中国外交也出现“新常态”。中国提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倡导基于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国际合作，都是具有进步主义与自由主义意义的新变化，但是外部世界对此的报道与理解明显不够。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就是中国践行上述新理念的实践。他指出，中国对美日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持开放态度，它是促进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努力的一部分，同时，中国研究、接受相关新规则有利于促进中国国内改革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中国与美日应当相互开放，中国应考虑加入TPP，美日应加入亚投行与“一带一路”。

王栋副教授就中日关系的未来、美国大选对中美关系及美日关系的影响与研修团进行了交流。他认为，中日关系

应当着眼于未来，对双边关系的发展要有明确的定位。“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对中日关系仍然适用。他认为，应当密切关注美国大选的进展，美国大选结果将影响中美关系与美日关系。

日本研修团对国际关系学院与参与交流的学者表示感谢，期望今后有更多的合作交流。



活动合影

日本 21 世纪论坛（梅下村塾）成立于 1987 年，宗旨是培养政府、经济界领导者，由日本代表性企业的经营者为中

心，对学员予以直接指导，培养肩负 21 世纪日本、世界发展的新型领导人才。

该论坛致力于构建广泛的人际网络，形成变革集团，强调为有志于前进与变革的人士提供突破既有概念、固定思维、旧有方式的场所。论坛发起人包括真藤

恒（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社长）、小林阳太郎（富士施乐注视会社社长）、

梅津升一（株式会社 US 集团社长）。其主要活动是每年指导一批研修生，迄今已举办 29 期，共培养 908 名学员。目前第 29 期在籍学员 40 名。（文/李帅宇 冯威）

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编辑：白杨

第四届北京国际淋巴瘤研讨会召开

2016 年 4 月 8 日至 10 日，第四届北京国际淋巴瘤研讨会在裕龙国际大酒店顺利召开。本届会议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瘤内科主办，中国临床肿瘤协会基金会、中国抗淋巴瘤联盟协办。北

京大学肿瘤医院大内科主任、淋巴瘤内科主任朱军教授主持大会。



会议现场

两年一度的北京国际淋巴瘤研讨会已经成为海内外同仁进行学术交流的盛会。来自国内外淋巴瘤临床、病理、基础研究等领域的 400 余名专家、学者共襄盛会，就淋巴瘤的规范化诊治及研究新进展等方面进行专题报告和讨论交流。本届会议日程安排紧凑，共设置 7 个专场，包括转化医学研究专场、淋巴瘤病理学专场、T 细胞淋巴瘤及霍奇金淋巴瘤临床专场、B 细胞淋巴瘤专场、临床应用研究专场、淋巴瘤特别专场以及多学科协作讨论会专场。



朱军讲话



专家、学者交流讨论

与往届会议相比，今年的会议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实”，本届会议不但在病理学、临床诊治、不良反应处理等方面为大家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特邀流行病学专家介绍了淋巴瘤的国内外发病率等情况，为淋巴瘤专科医师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流行病学数据。

第二个特点是“巧”，基础医学向临床医学的转化是大家多年来一直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巧妙地进行顶层设计、如何有效地进行运作和推动等问题经常困扰大家，本届会议想大家之所想，邀请国内外专家进行了相关内容的讲解，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第三个特点是“新”，诸如新兴的细胞治疗技术如 CAR-T 细胞治疗、EBV-CTL 细胞治疗、NK 细胞治疗等，抑或新兴的检查方法如 PET-CT，在本届会议上都有本领域内的知名专家进行答疑解惑，新

颖的理念和新奇的技术让人眼前一亮，收获良多。

第四个特点是“争”，虽然有的时候会议进行到很晚，但是大家讨论气氛热烈，尤其是在多学科协作专场，对某些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更是争论不休，正是在这些争辩中大家的临床诊治水平逐

渐获得了提高，无形之中也就推动着淋巴瘤规范化诊疗的进程。（文/刘卫平 图/朱建华）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山石

网教之声

第一门完全在线课程诞生三十周年

——在线教育开拓者琳达讲述老故事

1986年1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其前身是安大略教育研究所）推出完全基于因特网的第一门完全在线学分课程。今年1月份，我们迎来了第一门完全在线课程诞生30周年。这门课程的主题是“妇女与计算机在教育中的应用”，换言之，涉及性别问题和计算机的教育用途。这个主题本身很有趣，也值得关注。本课程主要围绕性别歧视以及女学生和女教师对计算机的教育用途缺乏兴趣这些问题展开。然而，它的设计和实施非常特别，可以说是首创之举，因此它也成为有史以来第一门完全通过因特网在线教学的课程。1983年，我获得拨款，专门调查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师应用计算机网络的可能性（之所以在安大略省开展调查，是因为这笔款项是安大略省教育厅给的）。虽然这笔拨款数目不大，但是足以使我能够开始研究这个“领域”。我寻找主持相关计算机会议系统论坛的加拿大高校教授并登门拜访他们。我拜访了使用圭尔夫大学（University of Guelph）研

发的Co·Sy会议系统的教授，也拜访了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使用自动教学用程控逻辑系统（Programmed Logic for Automated Teaching Operations, PLATO）和密歇根终端会议系统（Michigan Terminal System, MTS）Forum的教师。

然而，见面的情况令人对在线课程不抱幻想。使用在线会议系统或论坛为学生（尤其是通过计算机网络）开展协作学习创造环境——这对于当时的教师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他们告诉我，计算机网络不外乎是把计算机和打印机连接起来这些事情，根本不关乎对话讨论！

1986年1月推出的这门课程由我和多罗茜·史密斯（Dorothy Smith）博士共同设计和执教（Harasim & Smith, 1986; 1994）；我们也得到琳·戴维（Lynne Davie）在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我们正是在这门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提出了一种在线协作学习教学法，这种教学法在随后的岁月里被广泛用于指导

中学后教育的课程和专业发展活动并得到不断修改和完善。在线协作学习教学法的重点是改造面授课堂的各种小组学习活动，包括结对学习、小规模项目组、专题讨论和大班讨论（全体成员参加的讨论）等。自此以来，在线小组讨论和专题讨论已经成为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在线大学课程的组成部分。

学生对这门课程有浓厚兴趣，它有很好的口碑。我们的学生来自加拿大全国各地。结果，我被叫到教务处，因为教务长想知道为什么其他省份的学生也在想方设法报读我的课程。她非但不高兴而且还恼火，提醒我说：“这是安大略教育研究所。”她强调“安大略”，意思是说我们主要应该服务安大略省的学生。

虽然 30 年过去了，但是很多事情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当时大多数学生使用的是 150 或 300 波特调制解调器上网，速度比我们打字还慢。当时地理可及性（geographical access）困难重重，而且大学的网络是因时网[BITNET（Because It's Time Network）]，因此没有如何访问大学网络的信息。但是学生们聪明绝顶，居然能琢磨出访问网络的步骤。用户要通过输入命令才能访问网络。20 世纪 80 年代要上网并且保

持在线状态必须克服很多艰巨的挑战、完成很多步骤并且多次尝试，所有这些人今天恐怕没有人能理解了？

加拿大贝尔集团安大略公司（Bell Ontario）打电话给我，了解为什么安大略省那么多人想登录计算机网络。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对贝尔公司找上门的确感到吃惊。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加拿大贝尔集团就像一个黑盒子，外人几乎无法接触到里面的人。他们主动联系我，说明居然有人想登录计算机网络这件事使他们大为恼火、深感困惑。当时安大略没有多少人知道怎么登录计算机在线网络。贝尔集团没有把登录计算机网络的步骤公之于众，除非有人指点，用户都不知道要输入两点<.>还是三点<...>，这些都是任意的编码，不为一般人所了解。谁能猜出这是解锁登录的关键？这些都是圈内人士才知道的知识，他们在实践中有意或无意地限制公众登录网络。在那个年代，计算机网络被看作只有懂技术的人才能使用的东西，公众对其不感兴趣，也不觉得其有价值。

第一门完全在线课程招收 40 名学生，其中 20 名是为了得到安大略教育研究所学分的学生，另外 20 名是参加专业发展学习的非学分学生。因为我获得安大略省女教师联合会的拨款，作为调查

计算机网络教育用途的部分内容，这 20 名非学分学生参加了本课程的学习。这笔款项的一部分用于购买本课程使用的 Participate 在线会议系统。

这门课程获得巨大成功。基于我对在线教育前景和对计算机网络促使在线协作学习发生的潜能的坚信，我一直认为这门课程能获得成功。我当时坚信在线教育的潜能，虽然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这种信念一直持续到今天。当时我在考虑，在用户身居不同地方、在不同时间学习的环境下协作学习该如何设计？作为教师，我必须既能使学生对在时空分离的情况下开展小组活动感兴趣，又能使这些活动真正开展起来。那么，我要怎样才能设计这样的一种教学结构呢？这不是一个可以轻而易举应对得了的挑战，特别是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在线教育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人们对于如何在线交流经验有限，甚至可以说毫无经验，更不用说开展在线协作。我的做法是：以一个星期的在线学习为一个单元设计一门课程的教学；学习活动会持续一周或数周。比如，一次在线专题讨论可能持续一周，而一个小组项目可能需要三周的在线协作。课程活动按时间顺序展开，很少出现几项活动同时进行的情况。我这样做的目

的是确保各项活动的安排和开展井井有条。

与此同时，我还致力于创建一个井井有条的空间结构：明确谁与谁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以什么活动形式开展交流与互动。我模仿现实世界的建筑设计虚拟空间，把计算机会议系统在线环境分为不同房间或空间。我的课程在线环境有一个在线“咖啡厅”以满足社交需要，有各种房间可供专题研讨会使用（比如 A 室、B 室、C 室等），这些房间会根据在线活动安排开通和关闭。学生们会在某个特定时间段（比如某一个星期）聚集在一个指定的空间共同完成一项任务。我积极寻求并获得校外机构的资助，添置了技术设备。我自己设计并负责了第一门在线课程的教学，虽然当时安大略教育研究所大多数管理人员一点也不清楚我在干什么。事实上，当时又有谁能理解呢？

1985 年我采用了混合式教学法，1986 年 1 月我就采用完全在线教学法了。这门课程正式上线之前的两个星期恰逢圣诞假期，我产生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怀疑，也是最大的一次怀疑。我开始担心各种可能出现的意外。我整个圣诞假期都在思考各种后备应急方案，担心没有学生参加在线学习。然而，事实

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大家的在线学习热情高涨，所以接下来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满足师生在教与学过程中对交流、社区建设和协作的需求。

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一直在大学从事在线教学，时至今日，从来没有间断过。我讲授过研究生课程和本科生课程以及完全在线课程和混合式课程，负责在线教育的专业发展和师资培训。

2016 年 1 月我们不但迎来了世界上第一门完全在线课程诞生 30 周年，而且迎来了在线协作学习教学法和在线教育教学理论研究的 30 周年。此外，30 年的在线教学与研究也有了结晶——在线

协作学习理论的建构 (Harasim, 2012)。当然，时至今日，不管是从教学还是机构的角度讲，在线教育的一些关键问题仍然有待解决或仍然被人们所忽视。我认为，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地着力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实现在线教育的潜能。

作者：琳达·哈拉西姆 (Linda Harasim)，博士，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传播学院教授，在线教育开拓者。

译者：肖俊洪，汕头广播电视大学教授

来源：《中国远程教育》2016 年 3 期

教育信息化改革中国教育资源格局

我国教育信息化行业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向行业整合期过渡阶段，随着互联网普及、用户使用习惯的形成、企业市场推广等原因，用户规模到 2017 年预计达到 1.2 亿人。由于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巨大，投资热潮涌现，伴随而来的是企业并购融合，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各家争夺的战场逐步移到移动端。

教育信息化行业发展概况

教育信息化行业有着较为完整的生态系统，包括内容生产方、技术设备提供方、工具产品提供方、平台资源整合方以及行业监管机构和第三方教学测评机构。其中内容生产方主要有传统教育培训机构、各学校机构和互联网培训平台。同时伴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如大数据、语音识别、直播互动、远程测评和穿戴设备的发展创新有力地推动了教学场景的发展。

从国内看,由于教育信息化行业的属性,使得其准入门槛很低,在互联网高速发展期,此类型的公司达到 8000 多家,主要集中在 K12、早教、职业教育、语言培训、出国留学等。其中兴趣教育、教育媒体、家教 O2O 类型的公司越来越多,竞争格局加速垂直化。

从国际看,随着全球市场的复杂化,以及各国对教育信息化的认知程度的不同,导致了对其投资的力度也不同,另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技术水平也不一样,这就形成了多层次的竞争格局。西方国家的教育信息化行业已较为成熟,但是竞争战场不在国际,而是主要集中于国内。

行业进入快速增长期

2015 年 2 月教育部出台《2015 年教育信息化工作重点》,加速推进校园数字化建设;2015 年 3 月国务院发布《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强调互联网+战略;2015 年 4 月中央深改小组会议通过《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借力互联网+,打造中国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同期教育部发文支持中国特色“慕课”建设 2017 年前认定千门精品课;2015 年 9 月国务院核准和审批了议案支持教育信息化发展。2015 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关键一年,多项重量级政策出台,这些将持续

刺激教育产业相关领域,尤其是教育信息化行业将进入快速增长期。

中国拥有数量庞大的网民,越来越多的移动互联网用户成为教育信息化的潜在用户。2015 年,整体网民规模和移动网民规模达到 6.8 亿、6.0 亿,预计到 2018 年这一数据将为 7.3 亿、6.6 亿。

另一方面,随着相关公司市场推广的加强,用户对教育信息化的形式接受程度也在提高,预计用户在 2018 年将达到 13221.1 万人。

相关企业面临严重竞争挑战

目前,教育信息化行业门槛较低,相关企业较多,产品同质化严重,市场竞争激烈。另一方面,由于国家鼓励教育信息化行业的发展,加之进入门槛低,很多公司瞄准了这块富饶之地,伺机进入分一杯羹,这样更加剧了行业的竞争程度。

随着国内的发展,中国教育信息化行业当前正向重大的产业整合阶段过渡,对资金实力雄厚著名企业才能在竞争中胜出,并成为行业的整合者,没有实力的相关企业将面临严重的竞争挑战。同时,该行业存在产品替代性过强的硬伤。国内对知识产权不是很重视,加上纯互联网产品易复制易传播等特性,导致了网上充斥了很多的免费学习资源,相关教育信息化企业提供的产品内容如果没有

足够的吸引力,是很难打动消费者付费使用的。

来源:淄博新闻网

作者:许天生 林泽斌 于亦洋 朱永钦

■ 北大人物

温儒敏：五院人物

在北京大学静园的六个院落中，五院曾是中文系所在地。温儒敏先生在《书香五院》中谈到：“五院虽小，却用的上‘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句。平时比较安静，外来联系公务或参观的不算多，来者多为本系师生。遇到学术会议、开学报到，或者研究生报考、复试、答辩，等等，就人流不断，甚是热闹。来中文系讲学的国内外学者名人多，讲座完了，都喜欢在五院门口照个相留念。暑期给外国留学生办培训班，世界各地留学生的身影在五院交织，中西合璧，华洋杂处，也是一种别致的风景。”今日春光正好，让我们重温前辈们的光辉岁月。

五院是北大中文系所在地，我在《书香五院》一文已有介绍，这里所说几个人物，都是中文系的老师，和五院都是有些干系的，所以就凑成一篇，叫做《五院人物》。

陈贻焯先生没有教授的架子，胖墩墩的身材，很随意的夹克衫，鸭舌帽，有时戴一副茶镜，一位很普通的老人模

样，如北京街头常常可以见到的。不过和先生接触，会感觉到他的心性真淳，一口带湖南口音的北京话，频频和人招呼时的那种爽朗和诙谐，瞬间拉近和你的距离。先生有点名士派，我行我素，落落大方，见不到一般读书人的那种拘谨。谢冕教授回忆这位大师兄总是骑着自行车来找他，在院子外面喊他的名字，必定是又作了一首满意的诗，或是写了一幅得意的字，要来和他分享了。一般不进屋，留下要谢冕看的東西，就匆匆骑车走了，颇有《世说新语》中的所说“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神韵。我也有同感。八十年代末，陈先生从镜春园82号搬出，到了朗润园，我住进的就是他住过的东厢房。陈先生很念旧，三天两头回82号看看。也是院墙外就开始大声喊叫“老温老温”，推门进来，坐下就喝茶聊天。我是学生辈，起初听到陈先生叫“老温”，有点不习惯，但几回之后也就随他了，虽然“没大没小”的，反而觉得亲切。陈先生擅长作诗填词，在诗词界颇有名气。有一年他从湖南老

家探亲归来，写下多首七律，很工整地抄在一个宣纸小本子上，到了镜春园，就从兜里掏出来让我分享。还不止一次说他的诗就要出版了，一定会送我一册。我很感谢。知道先生喜好吟诗，这在北大中文系也是有名的，就请先生吟诵。先生没有推辞，马上就摇头晃脑，用带着湖南乡音的古调大声吟诵起来。我也模仿陈先生，用我的客家话（可能是带有点古音的）吟唱一遍，先生连连称赞说“是这个味”。后来每到镜春园，他都要“逗”我吟唱，我知道是他自己喜欢吟唱，要找个伴，他好“发挥发挥”就是了。我妻子也是听众，很感慨地说，陈先生真是性情中人。

陈贻焮先生不做作，常常就像孩子一样真实，有时那种真实会让人震撼。据比我年纪大的老师回忆，“文革”中北大教师下放江西“五七”干校。一个雨天，干校学员几十人，乘汽车顺着围湖造田的堤坝外出参加教改实习，明知路滑非常危险，却谁都不敢阻拦外出，怕被带上“活命哲学”的罪名。结果一辆汽车翻到了大堤下，有一位老师和一位同学遇难。陈贻焮本人也是被扣在车底下的，当他爬出来时，看见同伴遇难，竟面对着茫茫鄱阳湖，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没有顾忌，没有节制，那情景，

真像是一个失去亲人的孩子。他哭得那么动情，那么真挚，那么富于感染力，直到如今，那哭声犹萦绕耳际”。还有一件事，也是说明陈先生的坦诚与真实。到了晚年，陈贻焮的诗词集要出版，嘱其弟子葛晓音作序。葛晓音没有直接评论先生的创作艺术，而主要描述她所了解的先生的人品和性情。大概她是懂得先生一些心事的。当葛晓音把序文念给陈贻焮听时，先生竟像孩子一样哭出声来。葛晓音感慨：“先生心里的积郁，其实很深”。

陈贻焮先生是一位有广泛影响的文学史家，长期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这个领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相关研究著作主要有《王维诗选》、《唐诗论丛》、《孟浩然诗选》、《杜甫评传》、《论诗杂著》，等等。尤其是《杜甫评传》，按照古典文学家傅璇琮先生的说法，就是冲破了宋以来诸多杜诗注家的包围圈，脱去陈言滥调或谬论妄说，独辟一家之言。我对杜甫没有研究，拜读陈著时，只是佩服其对材料的繁富征引，又不致于淹没观点，特别是对杜诗作那种行云流水般的讲解，是需要相当深厚的功力的。在我和陈先生接触中，没有聆教过杜甫的问题。（他反而喜欢和我谈

些郭沫若、徐志摩等等)但有时我会想:先生为何选择这样一个难题来做?是否如他的弟子所言心里有很深的积郁?一个人一生如果能写出一本象样的甚至能流传下去的书,多不容易呀。先生对自己的学术成就显然有信心,但付出确实太多了。来镜春园 82 号聊天喝茶,在他的兴致中也隐约能感到一丝感伤。我知道先生正是在 82 号东厢这个书房里,花了多年的心血,写出《杜甫评传》,大书成就,而一只眼睛也瞎了。在旧居中座谈,先生总是左顾右盼,看那窗前的翠竹,听那古柏上的鸟叫,他一定是在回想当初写作的情形,在咀嚼许多学问人生的甘苦。

我在镜春园住时,经常看到陈贻焯先生在未名湖边散步,偶尔他会停下来看孩子们游戏,很认真地和孩子交谈。先生毕竟豁达洒脱,永远对生活充满热情。万万没有想到,2000 年他从美国游历归来,竟然患了脑瘤。他在病床上躺了两年,受的苦可想而知。他再也没有力气来镜春园 82 号喝茶谈诗了。病重之时,我多次到朗润园寓所去看望。他说话已经很艰难,可是还从枕头边上抽出一根箫来给我看,轻轻地抚摸着。他原来是喜欢这种乐器的,吹得也不错,可

惜,现在只能抚摸一下了。我想先生过去之时,一定也是带着他的箫去的吧。

吴组缃

吴组缃教授的小说写得很好。美国夏志清先生的《现代中国小说史》用笔非常吝啬,可是给了吴组缃教授专章的论述,认为其作品观察敏锐,简洁清晰。1978 年我还在读研究生,看到夏的评论,很新奇,就找吴先生的作品来看,果然功力深厚,笔法老辣,很是佩服。一次在王瑶先生家里聆教,王说吴组缃不但小说写得好,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也往往眼光独具,比如吴先生对茅盾《春蚕》的评价,认为老通宝这个人物塑造有破绽,虽然结论可以讨论,但其评论完全是从生活实际出发的,令人信服。据说北大中文系曾经邀请茅盾来系里讲学,茅盾说“吴组缃讲我的小说比我自己讲要强,不用去讲了”。我开始注意吴先生后,在王瑶先生家里也有过一两次照面,印象中的吴先生是很傲气的,我听着他们说话,自然也不敢插嘴。倒是听过先生的一次课,是讲《红楼梦》的,在西门化学楼教室。来听课的人很多,坐不下,过道都挤满了,有人有意见,希望外来“蹭课”的把位子让一让,吴先生说没有必要,北大的传统就是容许自由听课。吴先生几乎不看稿子(只有

一片纸），也没有什么理论架构，可是分析红楼人物头头是道，新意叠出。我们都慨叹：小说家讲小说又是另外一道风景！

真正与吴组缃教授有正面接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上。那是1987年春，在五院二楼总支会议室，除了导师王瑶先生，参与答辩的有吕德申、钱中文、樊骏和吴组缃等先生，都是文学史或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大家。王瑶先生叼着烟斗，三言两语介绍了我的学习情况，接着我就做研究陈述，说明是如何思考《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这一选题的。不料还没有等进入下一程序，吴组缃教授就发言了。大意是作家写作不会考虑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论文写这些东西的意思不是很大。吴先生就是这样不给“面子”。我一下子“傻了”：这等于是当头一炮，把题目都给否了嘛。我非常泄气。王瑶先生作为导师，自然要“辩护”几句，我都没有听进去，晕头晕脑出去等消息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我进去等待判决。想不到论文居然通过了，还得到很好的评价。后来听说，吴先生表示他其实并没有细看我的论文，不过临时翻了翻，听了诸位介绍，觉得还是可以的，又还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这就是“批判从严，处

理从宽”吧。不过事后想想，吴先生的批判不是没有道理的。研究思潮、理论，必须切合创作实际，否则可能就是无聊的理论“滚动”，“意思”的确不大。多少年后，我都记着答辩的那一身“冷汗”，让我学到许多东西。

林庚

林庚先生住在燕南园，老式平房，外观优雅，可是内里很阴暗，客厅里永远是那几个旧式书架，一张八仙桌，还有一个沙发，茶几上总是堆着他外孙的复习资料之类，一切都那样简朴。每次去看先生，总担心天花板上那快石灰块就要掉下来，建议找修建处来修一修。可是林先生说打从他搬来后不久就是这样了，劝我不必担心。我想办法找些让老人高兴的话来说。比如，看到街边小摊有卖他《中国文学简史》盗版的。我知道先生不爱钱，这消息倒是说明他的书至今影响大，甚至能进入平常百姓家。先生果然有些兴奋，便说起五十多年前他在厦门等地一边教课一边写书的情景。有时发现先生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和文学不搭界的话题。我不止一次听他讲到年轻时在清华学过物理，还听他讲观看足球或篮球国际比赛的“心得”（可惜我不通此道）。先生是诗人，有些仙风道骨似的，对功名利禄很超然，也很

低调，与世无争，反而健康长寿，返老还童。早些年每到春天，天空晴朗而又有一点风时，还能看见这位八、九十岁的老者，在五院门口的草坪放风筝呢。

2000年，林庚先生要过90大寿了。北大中文系历来能上90岁的好像不多，他就是我们系的老寿星了。系里想给老人搞一场比较象样的祝寿活动。古代文学教研室的老师说这是需要“动员”的。我和教研室一些老师便到燕南园去，先生不是很乐意，但最终还是答应了。祝寿会在勺园，开得很成功，来了近200多人，真是群贤毕至，学校的书记闵维方等领导也到场了。我们向学校介绍说林先生和季羨林先生是同学，当年林先生在文坛的名气比季先生还大，领导就很重视。与会者大都是文坛与学界的耆宿，合影时连袁行霈教授这样的名人（他可称得上是林先生的入室弟子了），都“不敢”坐到第一排，可见规格之高。记得我在会上代表中文系发言，称先生“由诗人而学者，在文学史研究方面所达到的具有典范性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北大中文系为拥有这样出色的学者而自豪。”我还说先生诞生的1910年，正好是北大中文系正式建立的一年，先生是专门为着北大中文系而生的，中文系感谢林先生几十年辛劳和智慧所建树

的卓越的业绩。那一天先生气色极好，还吃了蛋糕。

再有一次，是诗人兼企业家黄怒波先生捐款，促成北大诗歌中心成立，大家希望能邀请林庚先生出任中心主任。但先生多少年都是“无官一身轻”的，他能答应当这个主任吗？不是很有把握。那天我和谢冕、孙玉石、张鸣等几位老师一起，专门到林庚先生府上拜谒，向先生说明来意，没有想到先生说这件事“有意义”，很痛快就答应担中心主任。诗歌中心成立后，扎扎实实做了许多事情，活跃了当代诗坛创作与评论，原因之一便是有林庚先生这颗“大树”。

先生是2006年10月4日傍晚过世的。我接到他家人电话马上赶到燕南园。先生已经躺在床上，身上盖着白布。家人说他晚饭前还和人说话，感谢多年照顾他生活的小保姆，一下子就走了，那样平静。我看看先生，感觉他只是睡着了，甚至不相信这是一种不幸：诗人是很潇洒地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季镇淮

季镇淮这个大名，我上中学时就接触过，那是读那本北大版《中国文学史》留下的一点印象。到我上研究生时，对季先生就格外注意，因为听说他曾和导

师王瑶教授同学过，都出自朱自清先生的门下。按辈分总觉得我们算是朱自清先生的“徒孙”，那么季教授就是我们的“师伯”了。1978年季先生还给本科生上过古代文学史必修课，稍后又开设“近代文学研究”专题研究，比较冷僻，据说选课者也不多。很可惜，我一直没有去听过季先生的课。我在五院或是去五院的路上常见到季先生，他满头白发，老是一套蓝色中山装，提着一个布兜书袋，动作有些迟缓，身板子却还硬朗。偶尔也到我们研究生住宿的29楼来过，大概是有事找他的学生吧。我见到季先生不好打搅，只是点点头表示尊敬，然后又想象当年他和王瑶先生俩人共选朱自清先生一门课的传奇。

后来季先生接替杨晦教授担任中文系主任，那时我已经留校任教了。季先生这个主任当得非常超脱，很少过问系里的事情，连开会也不太见得到他老人家，等于是“甩手掌柜”。也是一种风格吧。我只去过季先生家里一次，在朗韵园，冬天，那时先生身体已经不好，家里有些寒意，他躺在椅子上烤电炉。记得是谁托我给季先生转交一样礼品。我顺便向先生请教了一些关于晚清学界的问题。先生说“材料很重要，是做学问的基础”，让我记住了。我与季镇淮

先生很少接触，但有一事印象极深，终身难忘。1981年夏天，北大中文系“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要毕业了，我们都在进行紧张的论文答辩。同学中有一位是做“南社”的，是季先生指导的学生。此君住在我宿舍隔壁，文才出众，读书极多，有点“名士派”味道，我们过从甚密，常在一起聊天，许多问题都向他请教。季先生与他这位学生的关系也挺融洽的。可是这位同学的“南社研究”准备得比较仓促，大概也单薄一些吧，季先生很不满意，时间不够了，那时没有延期答辩一说，怎么办？要是现在，可能凑乎过去算了。可是季先生不想凑乎，又必须尊重程序，便打算邀请中国社科院的杨某做答辩委员。杨某专攻近代史，对南社很有研究，但当时还没有高级职称，按说不能参与答辩的。大概季先生认为懂“南社”的行家难找，而随便找一位专家又怕提不出具体意见，就亲自到学校研究生处询问，看能否破格让杨某参与答辩。研究生处回答说：您认为可以就可以了。答辩时杨某果然提出许多尖锐而中肯的意见，并投了反对票，结果差2票论文没有通过。事后那位同学有些委屈，说杨某反对也就罢了，为何导师也是反对票？我实在也有些同情。此事在同学中引起了震动。

多年后，我看到黄修己老师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此事，说事后有人提及这次否决性的答辩，季先生对杨某投反对票还是很赞赏的。有意思的是，杨某也是季先生的学生，1955年上海地区一千人报考北大中文系，季先生负责招生，从中挑选了十人，就有杨某。对杨某来说，季先生有知遇之恩了，如今被恩师请来答辩，却又投恩师学生的反对票。而季先生呢，也不会因为师生关系不错，或者其他非学术因素，就放宽论文答辩评介的尺码。1981年我们那一届中文系研

究生（6个专业）19人答辩，居然有3人没有通过，确实非常严格。这种事情大概只有在秉承学术尊严的环境中，才能得到理解。

顺便说，我那位没有拿到学位的同学，也尊重这种严格的学术裁决，并不自暴自弃，后来到南方一所大学任教，兢兢业业，终成正果，成为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名家。

来源：北京大学微信号

编辑：张帆

蒋绍愚：我的自述

编者按：“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君子治学处事，立志高远却又基础扎实，胸襟开阔更能兼察微理。在“君子志道”栏目采访中，我们先后走访了一些北大的老教师。在这些交织着历史沧桑和个人生活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在历史长河中北大人默默担当的身影，感受到了北大人浓郁沉淀的家国情怀，体会到了北大精神的深厚源长。

在采访中文系蒋绍愚老师之后，蒋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他的这篇自述。这篇

自述融情于事、娓娓道来，向世人展示了那段波澜壮阔历史中的北大和北大人，与“君子志道”栏目也正相契合。现将此文刊载于此，一同分享给那些热爱北大、关心北大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感受北大老教师们的朴实与精彩。

蒋绍愚：我的自述

我是富阳人。1940年1月25日出生。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是北大中文系教授。曾任中文系副主任，中文系学术委员会

主任，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中心副主任、主任。2004年退休，但现在还受聘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并受聘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我在1992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在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

首先，我要说明，我不是名人。我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没有什么举世闻名的成就，只是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尽自己的能力，做了一些该做的事情而已。不是名人为什么要应邀写自述呢？一是为了感恩。我感到幸运的是，我出生在一个有文化素养的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名校，让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使我有机会亲炙几位语言学大师，得到他们的教诲和提携；又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能出国见世面、开眼界。我要在这里表达我深深的感激之情。二是为了留下一些资料，我出生在抗日战争年代，和我同时代的人一样，经历过不少曲折和坎坷，写下这些遭遇，可以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

一

我的籍贯是浙江富阳，老家是富阳大源新关村。我的高祖、曾祖都是小学教员。祖父蒋伯潜、父亲蒋祖怡都是大学教授，他们在富阳的《历史名人》中

都有传。我姐姐蒋绍惠、弟弟蒋绍忠也是大学教授，妹妹蒋绍恣和弟弟蒋绍心是搞科技的。我们的下一代也有人从事和教育有关的工作，已有六代人从事教育，所以，富阳市政府曾授予我家“教育世家”的称号。

我出生于1940年。不过出生地不是富阳，而是上海。那时我祖父在上海大夏大学教书，父亲在上海世界书局当编审，我家住在上海愚园路岐山村113号。著名学者钱家治先生（字均夫，是钱学森的父亲）是我祖父中学时的老师，两家关系很好，他家就住在我们隔壁。我出生不久，日军侵占上海，我祖父、父亲不愿在日本统治下做顺民，就携家离开上海，打算回到尚未沦陷的故乡富阳，然后应朱自清先生之邀去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在回故乡的路上屡经惊险。在离开上海时，我祖父准备带到西南联大讲课用的《校雠目录学纂要》的书稿藏在祖母的衣袖里，到上海火车站时掉了出来，被日本宪兵看到，把我祖父和父亲抓到车站地下室关押，后经亲友营救才得释放。从杭州到富阳要穿过日军的封锁线，夜间从富春江边的一个铁丝网的缺口中钻过去，那时我才两岁，吓得大哭起来，喊道：“我不要钻！”我母亲赶紧把一块糖塞到我嘴里，这才没有出

事。回到富阳，才知道金华和江西都已沦陷，西南道阻，去不了昆明，祖父只好写信给朱自清先生表示歉意，把一家老小安顿在富阳新关村的祖居里，祖父和父亲外出教书谋生。那时，我记得祖父和父亲寒暑假回来，祖父每天晚上给我讲孙悟空和猪八戒，讲岳飞和牛皋，我听得十分入迷。但一开学他们又走了，我还得等到下一个假期。

1945年，抗战胜利。我家从富阳回到上海，祖父任上海新陆师专中文系主任，父亲在正中书局当编审，我在新陆师专附小念了两年。1947年，我家从上海迁到杭州，祖父任杭州师范学校校长，父亲在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我进杭州师范附小念书。初中念的是杭州初级中学，高中念的是杭州第一中学。这三所都是杭州的名校，小学老师顾培怡，中学老师黄树滋、崔东伯等，都是全国知名的教师。杭师附小在柳浪闻莺，杭初在城隍山下，杭一中在贡院前。在这里上学，也享尽了西湖的湖光山色。我的小学、中学生活过得十分愉快和充实。这里还应提到夏承焘、陆维钊、任铭善、蒋礼鸿等著名学者，他们是我祖父、父亲的挚友，是我们的邻居。我当时还不懂学问之道，不能向他们请教学问，但他们的言谈话语，他们的学者气质，对

我是一种熏陶。我的少年时期在这人杰地灵的西子湖畔度过，吸取了丰富的滋养，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感恩不尽。

1957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全家都为我高兴。8月底，我跟着早两年已经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的姐姐来到了北京，进了这所最高学府的大门。这是多少学子向往的地方！在迎新会上，我见到了让人惊叹的教师阵容：王力、魏建功、游国恩、杨晦、岑麒祥、袁家骅、林庚、吴祖缙、高名凯、周祖谟、朱德熙、林焘（最后两位当时还是年轻教师）。我很幸运，在五年的学习中能听到这些在中国学术史上留名的学者讲授的课程。北大向来是开放的学风，所以，除了听本系老师的课以外，我还听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虽然时隔五十年，但这些大师讲课时的音容笑貌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

北大不但教师是第一流的，学生也是第一流的。考上北大的学生，很多在中学里都是尖子，难免有些傲气。但這些尖子聚集在一个班里，傲气自然就消了。我就是这样。入学几个月后，我自己觉得，在班上，我不但年龄是较小的，个子是较矮的，而且，在知识方面，我也明显地比别的同学矮一头。在50多年

后，在2009年欢迎北大中文系新生入学的报告会上，我和新入学的同学讲了自己当年的这种体会。我说：“有这样一种体会是件好事，可以激励自己不断努力。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群体里更是一件好事，有机会和这些优秀的同学互相切磋，在学业上可以更快地成长。”

最使我终身受益的，是北大教给我如何做人。民主和科学，始终是北大最宝贵的传统。一个人只要在北大受过民主和科学的洗礼，都会有一种“北大人”的气质：不俯首听命，不人云亦云。

二

我在北大学了五年（那时，北大文科是五年制，理科是六年制），收获是很大的。不过，那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五年是在不停的政治运动中和下乡、下厂中度过的。1957年的“反右派”，我们没有赶上，但我们赶上了1958年的“大跃进”。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到农村去，和农民一起深翻地，把农田挖下去两米多深，据说可以使粮食产量翻几番。我们参加了人民公社成立的大会，公社“一步跨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我们亲眼见到在公社食堂里全村农民“放开肚皮吃饭”，顷刻间把饭食一抢而空。我们也亲眼见到“大

跃进”过后的大饥荒，农村的壮劳力都去“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了，地里长满了荒草，颗粒无收，农民喝的真是能照见脸孔的稀汤。我们还到煤矿去“半工半读”，头戴矿工帽，身穿矿工服，下到几百米深的矿井里去挖煤，劳动之余再上一点课。五年里在学校上课的时间只有一半，而且，在学校也是政治学习不断，批判会不断，除了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还要批判自己的“名利思想，白专道路”。现在的年轻大学生听到这些，大概会以为是天方夜谭，但这确实是我们当年的大学生活。我们在毕业前做过一个统计：大学期间上过20多门课，但只有不到一半是上完了的，大部分不是因下乡下厂而中止，就是被政治运动、思想批判所打断。

1962年夏天我们毕业。那时大学毕业后是国家统一分配工作，那年形势不好，很多同学去基层、去部队，专业对口的为数不多。幸好那年北大中文系需要写作课的教员，有6个人留了下来，我是其中一个。七月毕业，九月就上讲台了，我教的是经济系三年级的写作，学生只比我晚入学两年，有些学生年龄比我还大。但无论如何，我总算带上了北大的红校徽，开始了我在北大的教学生涯。教了一年写作后，我调到了古代

汉语教研室，给历史系二年级教古代汉语，后来又给中文系 63 级的学生上古代汉语课。

1964 年，全国农村开始“四清”运动，北大的师生也响应号召，放下书本到农村去干革命，一去就是半年。中文系师生去的是湖北江陵，在那里我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还和他们一起搞“四清”，半年后回到学校。1965 年秋季，我给中文系新入学的 65 级学生上古代汉语课。但那时学校里的“社教运动”早已经开展，一派紧张的斗争气氛，全国的政治形势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1966 年上半年和学生一起到农村去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到 6 月 1 日，“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就“停课闹革命”了。

文革在学校闹了两年，1968 年 7 月军宣队、工宣队进校，教师和学生统统成了“臭老九”。首先受到处置的是教员，北大和清华是“毛主席亲自抓的点”，两校的教员一起到江西南昌的鲤鱼洲去“走五七道路”，在劳动中改造思想。鲤鱼洲是鄱阳湖中一块淤积而成的小岛，地面低于水位，四周有堤坝围着。那里本来无人居住，后来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在那里种了一些庄稼，我们去的地方则是尚未开垦的荒地。据说，这是特

意为北大、清华的教员挑选的地方，条件最艰苦，是最能锻炼和改造知识分子的好地方。我们到那里真是白手起家，刚到的时候，住在一个大仓库里，不论年老、年轻，都挨个睡在双层的大通铺上。过了一阵，自己动手盖起一个大草棚，才搬到大草棚里去，双层通铺变成了单层通铺，条件算是改善了一点。教员里也有夫妇俩一起去的，睡大通铺当然只好夫妇分居。过了一年，盖起几间简陋的“家属房”，夫妇才得以团聚。吃的饭菜，开头是从南昌买来的，开饭时只有一大桶米饭和一大桶蔬菜汤。在第一批先头部队到达时，为了到南昌买菜，在鄱阳湖里遇风翻了船，淹死了七个人。后来，自己种出了粮食和蔬菜，养了鸡，吃得才稍微好一点。在那里过的是集体化军事化的生活，我们都按连队编制，中文系、图书馆学系、图书馆、校医院合编一个连队，白天无论老少一起下地劳动，晚上分排分班政治学习。节假日是根本没有的，只有十天一“休整”，可以给家里写封信，或者洗洗衣服。说也奇怪，那样的生活过惯了，有点空闲反而觉得无聊：既不能看书，又没有别的地方好去，空下来干什么呢？

“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现在连个人生活的空间都不需要了，这真是改造得

差不多了。那时，我觉得：像我这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今后是不能再当教员了，只能在这里待一辈子，于是买了一本种蔬菜的小册子（只有这种书才准许看），准备终身务农了。

可是，到了1970年，忽然上级有指示：鲤鱼洲农场撤销，北大、清华的教员回学校。我收拾了一下再简单不过的行李，离开了鲤鱼洲。中途到杭州去看了看父母，很快就回到了北大，又住进原来的教员单身宿舍里。

那时，北大已招收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的口号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我们这些教员，当然就是“管”和“改”的对象。不过，当我们接触这些年轻学员的时候，觉得他们大多数还是想来学知识的，对教员还比较亲善；至于在“反右倾翻案风”时，他们会抓住教员的片言只语狠批，那是奉命行事，怪不得他们。然而，就是“工农兵学员”，在学校这个“大染缸”里待久了也会变质。所以，当时又提出“开门办学”，就是要把课堂搬到工厂、农村去。北大中文系响应号召，1974年春节刚过，就把教员和学生带到了北京郊区的齿轮厂和内燃机厂（领导中文系的工宣队就是这两个工厂派的），在那里居住和上课。

那时我的儿子刚刚出生，妻子坐月子无人照顾，承领导恩准，给了一个月的假，等妻子坐完月子才走。

当时认为，教员讲，学生听，是一种修正主义的教学方式；无产阶级的教学方式应当是以任务带教学，而任务必须根据当前的政治需要来确定。那时的政治是“评法批儒”，工农兵要搞批判，就要看一些古书，于是从1974年9月开始，动手编写一本简明的古汉语字典。编字典也必须“三结合”，就是参加者要有工人、工农兵学员、教员，前两者是主力，教员是配角。参加字典编写组的老教师有王力、岑麒祥、林焘，还有一位从中国人民大学过来的戴澧。中、青年教师是唐作藩和我，再有商务印书馆的两位编辑张万起、徐敏霞，这就是后来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上署名的八个人。那时，参加编写的教员都要住在工厂的宿舍里，四位老先生也不例外。王力先生和林焘先生住同一间宿舍，上下铺，王先生在下铺，林先生在上铺。吃饭也是自己拿着饭碗到工厂食堂，和工人们一起排队买饭。周六下班后挤公共汽车回家，周一早晨8点以前必须赶回来。当时王先生74岁，林先生53岁。当然，这种待遇比起住“牛棚”、扫厕所已经好多了。



1974年古汉语字典编写组合影，前排从左到右依次为戴澧、王力、岑麒祥、林焘，后排从左到右依次为蒋绍愚、张万起、唐作藩、徐敏霞。

到1975年年初，“开门办学”的73级学生即将毕业，从工厂回到学校，但字典还没有编完，字典组的人员住到了商务印书馆。老先生还是两个人一间，上下铺；星期六晚上回家，星期一早晨回来。过了一阵，我看到王力先生实在年纪太大，怕出意外，就报告了系领导，让他回家住。我负责每周一次，把“三结合”编写的字典初稿带回北大请王力先生修改；到下一周，再把新写的字典稿带去，把王力先生修改过的字典稿带回来。字典的大部分稿子都是用这种方式，经王力先生修改过的。后来，字典编完了，字典组撤离商务印书馆。当时我是编写组的负责人，字典的稿子集中在我手里。虽然大部分条目经过王力先生修改，但由于当时的编写情况，初稿还有不少错误、不妥和粗疏之处。我又

用了一两年的时间统稿，觉得比较像样了才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字典定名为《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是请王力先生题写的书名，于1978年正式出版。

这本字典出版后很受读者欢迎，接连重印多次，听说中学生几乎是人手一册。字典在1995年获得首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到2013年6月已经是第100次印刷。当然，我也明白里面存在的问题，所以字典后来多次修订，1988年、1993年、1998年都做过修订，1998年修订后称为“1998版”。到2005年又做了较大修订，称为“第4版”。今年又做了全面修订，出版后将是“第5版”。

我1962年北大毕业，当时22岁。到1978年《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出版时，我已经38岁。这中间16年的青春岁月，大部分都浪费了，想起来真是感慨。

三

1978年，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北大中文系汉语专业进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教学走上了正轨。在这样的形势下，我深切地感到，如果再不加倍努力，把荒废了的时间夺回来，将会一事无成。这一年，是我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起点。

我虽然起步很晚，但我感到很幸运：在我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之后，得到了两位大师的教导和指引。

第一位是王力先生。我在进北大之前就久闻王力先生的大名了。1958年，我上大学二年级，我们的古代汉语是王力先生教的。课堂是一个能坐100多人的大阶梯教室，但很多校外的人也慕名而来，教室挤得满满的，台阶上也坐满了人，还有不少人站着听课。王先生讲课神态从容，语调平稳，一字一句都讲得很清楚。在讲《左传》中的“蹇叔哭师”时，王先生说，文章的末尾一句，应该带着哭腔，用拉长的降调来诵读：“秦师一遂一东——！”这些细节，今天都还能清晰地回想起来。

1963年，我从写作教研室调到古代汉语教研室，是王力先生找我谈的话。当时王先生是古代汉语教研室主任，他把我叫到他家里去，问我：“听说你很喜欢看古书，你愿不愿意到古代汉语教研室来？”我当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回答说：“我希望将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我还要考虑考虑。”王先生很和蔼地说：“那你就再想一想吧。”回到宿舍，我把这事写信告诉了我父亲，父亲很快就回了信，说：“能跟着王力先生学习，这是别人求也求不到的事，你还

犹豫什么！”这样，就定下了我一生的研究方向。所以，我常说：王力先生是我学术上的引路人。

在编《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时，我向王先生求教的机会较多，每次在周末把字典稿送交王先生审阅，并取回王先生修改的字典稿时，我怕耽误王先生的时间，不敢待长，但有时也会向王先生请教一些问题，或陈述自己的一些浅见，王先生总是耐心地给予指导和鼓励。

1979年，我写了一篇论文《杜诗词语札记》，投给了北大中文系的刊物《语言学论丛》。《语言学论丛》请王力先生审稿，王力先生写了审稿意见：“此文很好，其中几条很精彩。可用。”这篇稿子在1980年9月的《语言学论丛》第6辑刊出，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王先生的审稿意见就写在我的稿子上，编辑部在若干年后把稿子交还给我，我一直珍藏至今。我写的另一篇论文《论词的“相因生义”》是为《庆祝王力先生80寿辰论文集》写的，也是经王力先生亲自审阅，同意收入论文集。只是这本论文集出版得太慢，到1989年才出版，那时王力先生已经去世了。

1983年，我从讲师晋升为副教授，为我写评语的有校内外专家各一位，校内就是王力先生写的评语。那评语我至

今未曾看见，但我知道，这是王先生对我的提携。

王力先生一生都很珍惜时间，到了晚年，他更是决心要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完成了很多部著作。文革以后，向王先生请教的人很多，王先生都热情地予以接待。作为在他身边的弟子，我很清楚这种情况，所以很少去打扰先生，向他当面请教的机会反而不多。但王力先生的学术思想对我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我能在研究中作出一点成绩，都是在王力先生学术思想指导下取得的。王力先生对我的指导和提携，我将永世不忘。在王力先生去世之后，我常常去看望师母，以此作为对师恩的报答。

另一位大师是朱德熙先生。朱德熙先生比王力先生小 20 岁，我们入学时他还是年轻教师，但因为和吕叔湘先生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已经是全国闻名。我们在大一时，朱先生给我们讲现代汉语课。我们这批学生，都是怀着“作家梦”进中文系的，对语言学感兴趣的寥寥无几，只因为现代汉语是必修课，不得不听。可是没有想到，朱先生能把现代汉语语法讲得那么吸引人。课堂上每一个同学都全神贯注，思路跟着朱先生转，不知不觉地到了下课时间，大家还意犹未尽，

思考和争论朱先生在课堂上讲的问题。

其中的奥妙何在？是朱先生讲课非常风趣吗？不是的。文如其人，朱先生的讲课，非常严肃认真，从不哗众取宠。真正的奥妙在于：朱先生对现代汉语的语法问题有很深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他常常从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些语言现象出发，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跟着他一起思考，一起探索其中的规律。他给予学生的一种探索的乐趣，发现的乐趣，这是任何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所能享受的最大的乐趣。我后来在教学中也想学习朱先生这种教学艺术，可惜一直没有学到家。

朱先生的奖掖后进也是有名的，他的几个大弟子，都成了现代汉语的著名学者。我因为专业方向不是现代汉语，未能亲炙朱先生的教诲。大约是在 1982 年，有一次朱先生把我叫去，语重心长地说：“北大中文系古代汉语很强，现代汉语也很强，但中间一大块近代汉语，还没有很好的研究，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一块做起来？”我明白，这是朱先生为中国语言学发展所作的战略性部署。近代汉语是承前启后的，近代汉语研究做得不好，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就无法贯穿，整个汉语的历史演变脉络就会拦腰截断。可是，近代汉语的研究薄弱，不

但北大如此，全国都如此，这个重大任务，我能担当起来吗？面对朱先生，我只好回答：“我尽力去做。”朱先生鼓励了我，同时指示给我一些方法：首先从近代汉语语料的收集整理做起。他让我向社科院语言所研究近代汉语的专家刘坚先生学习，并建议北大中文系和社科院语言所合作做一些相关的研究。遵照朱先生的指示，我找了刘坚先生，商量好合作做一个项目：编纂近代汉语研究资料。正好美籍学者康奈尔大学教授梅祖麟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了编纂近代汉语语法资料的设想，朱先生就请梅先生在1983年到北大访问，开设近代汉语研究的课程，并请他提供一个近代汉语语法资料的书目。

1983年的一天，朱先生亲自到我家来，弄得我十分狼狈：那时我的住处十分寒酸，一个12平方的小屋，吃、住、看书都在这里，房间里放一张双人床后，只能放下一张书桌、一把椅子。朱先生进门来，我只好站起来，请他坐那把唯一的椅子上，我自己坐在床上。朱先生对我说：“今年9月，要在太原开全国第一次语言学科规划会议，会议请你参加，谈谈近代汉语研究资料的汇编问题，你可以把梅祖麟的那份书目带去，请专家们一起讨论。”我听了简直不敢相信：

全国第一次语言学科规划会议能让我这个无名小卒参加？朱先生看出了我挂在脸上的疑问，亲切地说：“这次会议有老专家，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都会去；也有年轻人，比你高两届的鲁国尧，和你同班的王镆，会议也邀请了。”我心里十分激动：朱先生是这样大力提携年轻人！临开会前，朱先生先去太原筹备，我陪伴着王力先生稍后到达。可是，到太原一见到朱先生，我才想起：因为注意力集中到陪伴王先生，竟然把梅先生的书目忘记带了！我连声自责，不知怎么才好。朱先生却和蔼地说：“不要紧，明后天还有人来，赶紧托他们把书目带来。”会议把加强近代汉语研究列入了规划。结束时全体留影，对我来说，这张和全国著名专家的合影，真是无价之宝。

规划会议后，我们和社科院语言所合作的项目加紧工作，成果是三卷本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90年、1992年、1995年出版。这部书为近代汉语的研究者提供了基本的语料，推动了近代汉语研究的发展。

为了完成朱先生交付的任务，我在做资料汇编的同时，还全面地了解了近代汉语研究的成果，在北大开设了近代

汉语研究的课程，向学生介绍近代汉语研究的概况。在此基础上，动手撰写《近代汉语研究概况》一书，目的是让年轻学者了解近代汉语研究的现状，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研究。这本书写作的构想，我曾向朱先生报告过，得到朱先生的关心和指导。这本书在1994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可惜那时朱先生已经去世，我未能把这本书呈献给朱先生。后来，我对近代汉语的一些专题做了一些研究，多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我把《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做了较大的修改，把自己的看法写了进去，改名为《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大出版社2005年出版。这两本书，多年来我用作在北大开设“近代汉语研究”课程的教材，也被全国很多高等学校用作教材。

从1980年到现在，近代汉语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很多年轻人怀着很大的热情投身于近代汉语的研究，近代汉语研究被称为一门“显学”，和1980年以前相比，其研究成果和研究深度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吕叔湘、朱德熙等前辈学者大力倡导和推动的结果（吕叔湘先生是近代汉语研究的先行者和倡导者，这在学术史上已有定论，此处不赘）。我能在朱先生指导下做一些工作，感到非常荣幸，非常有意义。

1984年，社科院语言所的“青年语言学家奖”首次评奖，我和郭在贻、李家浩三人获奖。后来听说，朱先生是推荐者之一。我真感谢朱先生对后进的奖掖！但心中也非常惭愧：我那年已经44岁了，还算是“青年语言学家”，真是汗颜！而且，我的研究成果质量不高，难以和另外两位比并。我暗自下决心：今后一定要加倍努力，争取出质量高一点成果，用以弥补今日的不足。

朱先生对我的教导和提携是多方面的，在这里我无法一一叙述，但我都一一永记在心。每当我想起这些，我都会鞭策自己：无论何时，都要不懈地努力，否则就对不起朱先生。



1984年社科院语言所“青年语言学家奖”首次评奖时合影，从左到右依次为李家浩、蒋绍愚、吕叔湘、郭在贻。

四

改革开放给我带来的一大好处是：使我有机会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开阔了学术视野。

1981年，北大派出三名教员到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Sinological Institute, Leiden University）做研究：历史系的张广达、中文系的陈熙中和我。莱顿大学是国际著名的大学，汉学院也是国际知名的汉学重镇，当时的汉学院院长许理和（E. Zürcher）是国际著名的汉学家、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著名的汉学刊物《通报》的主编。能去这样一个地方，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莱顿是一个大学城，莱顿大学是这个城市的主体。城市不大，没有繁华的街道和林立的高楼，交通也不拥挤。我们住在郊外，骑着自行车去汉学院，一路都很安静。后来我到过很多欧美的大城市，但都觉得没有莱顿舒适。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见到什么都觉得新鲜。我们三人合住一个三室一厅的一套房，看着客厅里的沙发、电视和厨房里的电器，我们都说：“我们享受部长级待遇了！”其实，过了几天就知道，这是很普通的居民住宅，我们的邻居都是普通居民。我到附近一个小商场去购物，还没有开口说话，售货员就迎上来

问：“Do you speak in Dutch, English or French?”这使我对他们的语言能力大为惊讶。这是长期封闭的结果，现在的年轻人出去，就不会这样大惊小怪了。

莱顿大学汉学院收藏很多中文书，特别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收藏的中国小说是那里的特藏。但我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没有怎么看那些书。我在那里主要是看了一些西方的语义学方面的论著，这对我有很大启发。我还把许理和的著名论文“*Late Han Vernacular Elements in the Earliest Buddhist Translation*（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译成中文，并请许理和审阅，回国后，这篇译文刊出在《语言学论丛》第14辑上。另外，在那里和人交往都要用英语，也促使我努力提高自己的英语的听说能力。这些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有很大帮助。

莱顿大学汉学院的梁兆兵教授是个很热心的人，他为我们联系了去巴黎和伦敦访问。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里，我阅读了一些敦煌卷子。那时，这些珍贵的文献还没有做成缩微胶卷，外面是看不到的。当我坐在阅览室里，小心翼翼地展开那些一千多年前手抄的卷子时，心情真是十分激动，那种情景，今天还能清楚地回忆。在巴黎和伦敦还

见到了一些西方著名的汉学家，如英国的格雷姆（A. C. Greham）、瑞典的马悦然（G. Malmqvist）等。格雷姆现在已经去世。马悦然后来在瑞典又见过，近年还有联系；他是著名汉学家高本汉（B. karlgren）的大弟子，是诺贝尔奖的终身评委。

我去莱顿大学的时候，儿子才七岁，刚上小学。我的妻子徐伏莲是北大图书馆的馆员，每天八小时工作，身体又不好，我怕我出国后她的负担太重，所以很犹豫。但她却很坚决地说：“这样好的机会，你去吧，儿子我来看！”对于她的支持，我永远心存感激。

第二次出国是在 1989 年至 1990 年到美国斯坦福大学亚洲语文系 (dept. of Asian Language, Stanford University)。那时北京正是肃杀的季节。很感谢东亚语文系系主任王靖宇教授，他邀请我在这所世界名校教了两个学季（美国的学制，三个月为一学季）的古代汉语。听课的人数不多，只有 7 个学生，但其中有的是华裔，有的是美国人，还有一个是日本人。讲课用中文是不行了，被迫无奈，只好勉强地用很不纯熟的英语。好在学生们都很理解，我说错了，他们会善意地加以纠正。半

年下来，我和学生们相处得很好。这是我在国外用英语讲课唯一的一次。

在斯坦福我认识了黄正德、李壬癸等著名学者。还有一次，伯克莱大学王士元先生主持一个学术讨论会，我应邀参加。到会的有很多学术名家，如：丁邦新、郑锦全、梅祖麟，以及法国的贝罗贝（Alain Peyraube）；朱德熙先生那时在华盛顿大学讲学，也过来参加了会议。那些学者，我以后在其他学术活动中和他们多次交往，有的联系还很密切；他们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在斯坦福也接触到一些台湾的学人，他们对我没有什么戒心，一些活动都邀请我去参加。

接着是 1991 年，美国俄亥俄大学亚洲语系（Dept. of Asian Language, Ohio University）系主任薛凤生教授邀请我去做研究，和他一起编写一本给美国学生使用的古代汉语教材。那本教材 2007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 *Classical Chinese Primer*（《古文入门》），据说很受美国学生欢迎。

以后，我还到了不少地方去做教学或研究：

1993 年，到捷克查理大学东亚系作唐诗系列讲座。

1997 年，到日本筑波大学讲授中国语言学集中课程。

1999年，到挪威科学院和何莫邪院士一起做 *Thesaurus Linguae Sericae*（《新编汉文典》）。

2003年，到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做研究。

2005年，到瑞典高等社会科学院做研究。

2009年，到马来亚大学语言学系讲课。

此外，我还应邀到澳门、香港、台湾的大学任教：

1995—1997，到澳门大学中文系任教两年。

2002年，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一学期。

2004年，到台湾大学任教一学期。

2010年，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一学期。

我还多次出国和到港澳台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我30多年来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最深的一点体会是：在这个时代，从事汉语研究，要有世界眼光。这30多年来，在国际上，各种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发展很快。对这些理论和方法，我们首先要有所了解，同时要有分析、有取舍，把其中有价值的东西运用于汉语的研究，并从中总结和发现新

的规律、新的理论，对世界的语言研究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我自己未能做到，但希望年轻的一代能达到这个目标。

五

我已经年过70，从教也已50多年。回顾我走过的路，我只做了教学和科研两件事。教学方面，我教过本科生的古代汉语、大学语文，为中文系和国学院的硕士生、博士生开设过一些课程：唐诗语言研究、近代汉语研究、汉语历史词汇学、《论语》研读。我培养了30多个博士生、硕士生，其中很多是优秀人才，有的已经是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对教学是认真的，对学生是负责的。科研方面，我发表了100多篇论文，一些重要的论文汇集成两本论文集：《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续集》（商务印书馆，2012）。出版了一些著作，主要的有：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负责统稿，商务印书馆，1978年。以后多次修订）。

《古汉语词汇纲要》（北大出版社，1989）。此书在韩国出了韩文译本（李康齐译，韩国CHINA HOUSE出版，2012年）。

《唐诗语言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2002年增订）。

《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大出版社，1994）。

《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大出版社，2005）。

《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三卷，刘坚、蒋绍愚主编，商务印书馆，1990—1995）。

此外，我还和徐昌华一起翻译了日本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北大出版社，1987、2003修订译本）。我在学术造诣方面只是一般，不过是尽了自己的努力而已。

现在人的寿命长了，过了70，只要身体允许，还可以做一些事。我愿意继续为社会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原文略有改动）



人物简介：蒋绍愚

蒋绍愚，1940年1月出生于上海，籍贯浙江富阳。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教龄达50余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文系副主任，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 中心副主任、主任。现受聘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分别于1992年、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和国家级“教学名师”。主要著作有《古汉语词汇纲要》《唐诗语言研究》《近代汉语研究概要》《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统稿）。此外，还先后主编《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蒋绍愚、曹广顺主编）等。发表百多篇论文，

部分论文汇集为两本论文集：《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续集》。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山石

学者谈读书

为什么要读王小波

我曾列出一份说理者的谱系。百年中国，理性备受摧残，零落成泥，说理者寥若晨星，有如稀世之珍，其代表人物，不过三五人：先贤首推胡适，我们的同时代人，包括王小波、刀尔登、徐贲等。有人说，应该加上殷海光，你不是素来向我们推荐他的《逻辑新引·怎样判别是非》么，然而殷先生虽是逻辑学家，他最具影响力的那些文字，却不以逻辑，而以激情见长；有人提醒，你怎能漏掉了顾准！我一向钦佩顾先生在那个黑暗时代的坚守和跋涉，却也不得不指出，其盛名之下，多少有些被神化的成分，这一点与陈寅恪一样，其次，顾先生惯用的话语，尚且深陷于意识形态的桎梏之中，这是时代局限，不必苛责，不过说理首要讲究语言，顾先生的语言并不适合说理，故而只能将他请出说理者谱系。

再说谱系之上这四人，有一脉相承之处，同时各擅胜场，各具千秋。相形之下，胡适胜在风度，其说理，平心静气，娓娓道来，如春风化雨，润人心田，

此外，胡适所恪守的持平之论与容忍之道，不仅构成了说理的坚固根基，还呈现了说理的正大风范，有时读者未必认同其观点，却服膺其风度；刀尔登胜在视角，若以武功拟说理，胡适出身名门，刀尔登则属妖刀（徐贲接近胡适，王小波则介于他们之间），无论谈历史还是现实，刀尔登妖刀一闪，寒光过处，常常从出其不意的角度直入问题的本质，令人在惊奇之余，还有惊艳之感；徐贲则把说理发展成了一门学问，那本《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不啻是写给公众的教科书，老少咸宜，雅俗共赏（有人将此书与陈嘉映《说理》并提，如陈嘉映所言：“所谓哲学，大致就是穷理”，他的说理，更多指向哲学，徐贲的说理，则指向公共生活），而且，唯有在徐贲这里，说理才与公民明确发生了关系，被视为公民的必备素质之一；至于王小波，在这些人中，则是把说理的智性与趣味结合最好的一个。

趣味这玩意，见仁见智，同一事物，如王小波的小说，有人会觉得有趣，有

人却以为无趣，断言其小说成就远不如杂文。这一节争议，姑且抛开不论，单说智性。在我看来，王小波的杂文，不仅在于智性的表达，更在于，他力图诠释，为什么要追求智性，为什么要过一种智性的生活。换言之，他在说理的同时，还告诉读者，为什么要说理。

在王小波笔下，说理与智性，有一个特定的说法，叫“明辨是非”。按理说，明辨是非该是人类成长的方向，倘不明辨是非，难道要不分是非么？然而中国恰恰有一大传统：难得糊涂。它可以分解为两个关键词，一是装傻，二是比傻。对一些人而言，你的确难以分辨，他们的糊涂，到底出于自愿，还是被迫，不过其终点并无差别：“有一些时期，每一天都是愚人节。”那些愚人，不止丧失了明辨是非的能力，甚至丧失了明辨是非的动力，他们构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以装饰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

青年王小波曾受萧伯纳的剧本《芭拉少校》误导，痛下决心，不想做一个明辨是非的人。后来他改悔了，反其道而行之，以至他所写作的杂文，“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这背后的转向，他曾用知识分子意识来解释，诸如“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

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在我身上，追求智慧的冲动比追求快乐的冲动还要强烈”云云。不过我觉得，明辨是非绝非知识分子的专利，任何一个正常人都该如此，王小波不是说过么，伦理问题——“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是大家的事（其实知识分子明辨是非的能力未必一定超过普罗大众，这一点就当下来看表现尤为鲜明）。我愿以最大的善意揣测：在明辨是非与难得糊涂这两个选项之间，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前提是允许他们自由选择。

真正的问题在于，在“每一天都是愚人节”的残酷语境之下，愚人都以为自己脑中和手中掌握了“是”，或者有人替他们决定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因此再无必要分辨是非。这所导致的最大戕害，还不是是非的混淆与湮灭，而是思想本身的沦丧，我们既不知道如何去思考，更无从发掘“思维的乐趣”，捍卫思想的尊严。

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关于说理，相比说出什么道理，怎样说理毋宁更为重要。现在可以补充一句：为什么说理毋宁更为重要。王小波喜欢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

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我还是以为，不独知识分子，但凡正常人，都要讲理，都要以理服人，能否做到这一点，恰是常人区别于愚人的显著标志。

生于1952年的王小波，惯于拿他的青春期生活说事，那个年代强权当道，无理可讲。我们生存的年代，貌似有所进步，实际上能好到哪里去呢：理性与客观、中立一道，渐渐沦为贬义词，说理毫无立锥之地，现在流行什么，试看一位名人的教导：

“你说话很温和，你观点很中立，你性格很宽容。

那你不要写公号文章了。

你不适合。

你看了《乌合之众》就会知道，任何时代的领袖，包括意见领袖，都是特别偏激的。

偏激的观点才具有煽动性。

你的标题必须简单粗暴，情绪明确。

爱憎特别分明的人更适合写新媒体文章。”

假如王小波在世，撞见这一幕，不知作何感想。他毕生都在与愚蠢、偏见搏击，时至今日，愚蠢和偏见依然大行其道。他曾经被强权发配为“沉默的大

多数”，生于今世，恐怕得照旧直面沉默的厄运。

反抗沉默，可谓王小波的宿命。

“……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以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写完这段话的22天后，他因突发心脏病而猝死于中国的午夜。他的英年早逝，使这些平实的汉字，竟有了一丝壮烈的味道，尤其是对照每况愈下的现实而言。

我愿在王小波的英灵之前，冠以“说理者”三字，以示我的感激和纪念。也许，恰恰因为这不是一个适合说理的时代，说理才愈发具有意义；这不是一个适合王小波生存的时代，阅读王小波才愈发迫切。

2016年4月11日

作者：羽戈

来源：微信号 逻辑学

书，我们的避难所

假如你在口袋或是背包里放上一本书，特别是在悲伤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拥有另外一个世界，一个给你带来快乐的世界。**在我不幸的青少年时期，只要想到有这样一本书——一本我渴望阅读的书——我就会心生安慰。这足以帮我打发上学的日子，否则我就会哈欠连天，弄得满眼泪水。后来，正是这种想法使我得以忍受某些无聊的会议，那些我出于义务或是礼貌而参加的会议。此刻，让我来谈谈促使我读书的缘由，**我所说的读书，不是为了工作，也不是为了自我熏陶，而只是为了自娱自乐。**

1. 前面我曾提到的来自另一世界的吸引。这可能被当成逃跑主义。但即便纯粹出于想象，只要能逃离日常生活的悲苦，在另一个世界里度过一些时光，总还是有它的好处的。

2. 十六到二十六岁期间，为了让自己有所成就，提升思想意识，从而完成灵魂的塑造，我付出了种种努力，而读书最为关键。我该成为怎样的人？世界的意义是什么？我的思想、兴趣、梦幻、脑海中浮现的国度又能伸展多远？我追寻着别人的人生、梦想，以及他们小说和文章里所展现的深思熟虑。我知道，

我会将这一切都保留在记忆的最深处，永不忘怀，就好比一个小孩永远不会忘记他第一眼见到的树、叶子和猫。通过读书获得的知识，我规划出走向成年的道路。我正是带着这种孩子气的乐观主义着手塑造自我的。因此，在那几年里，读书是一件强度极大却又轻松好玩的事。当然，它从未脱离我的想象。但如今，我几乎不再这样读书了，大概也正是这个原因，我现在读书比从前少了很多。

3. 还有一个原因让我觉得读书特别令人享受，那就是自我意识。我们读书时，内心某处总是不愿将自己完全融入其中，而是乐于沾沾自喜，认为我们正在完成一项深邃、颇费心神的任务：也就是，读书。对这一点，普鲁斯特有很好的理解。他说，**我们总有一部分心神会游离于书本之外，思忖着我们正坐在什么样的桌子旁边、琢磨着那照亮了餐盘的灯光，以及周围的花园或远处的风景。**而一旦思及这些，我就开始品尝孤单的滋味，感受想象的魅力了，同时又洋洋自得，认为自己远比那些不读书的人更具深度。对那些喜欢吹嘘的人，我

虽然很不耐烦，但对于一个读者不算过分的沾沾自喜，我还是能够表示理解。

因此，在谈论自己的读书经验时，我必须强调的是，倘若我能在电影、电视，或者其他媒体里，找到之前所谈及的快乐，那么，我就不会读这么多的书。或者某天真会如此，但我认为可能性很小。因为词语以及由它构建的文学作品，就如同水或者蚂蚁，没有什么能如它一般迅速，彻底地穿透生活的缝隙、洞穴和无形的鸿沟。正是在这些缝隙中，某些令我们对生活、对世界感到好奇的事物本质，就会最先彰显出来；而最先揭示了它们的，正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就如同你期待得到的良策高见。它像最新的新闻一样，带有不可或缺的光环。正因如此，我始终十分依赖这些优秀作品。

然而，我认为在谈论这种快乐时，我们不应该将其与欣赏和观看的种种乐趣对立起来。我之所以这么想，或许是因为在七到二十二岁之间，我曾渴望成

为一名画家，并耗费大量光阴痴狂地练习绘画。对我来说，读书就是在脑海中为作品设计电影版本。我们的目光可能已离开书本，注视着墙上的绘画、窗外的景致，或远处的风光，但这些其实都游离于我们的思绪之外，因为我们正忙于将书中的想象世界编成电影。要看到作家所想象得世界，要在另一个世界中找到快乐，我们必须让自己的想象力发挥作用。而书本让我们觉得，我们不仅仅是想象世界的旁观者，也是其中的创造者，它赋予我们创造者孤独的幸福。正是这种孤独的幸福吸引着众人来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而对于作家，它也同样不可或缺。

来源：微信号 飞地

作者：奥尔罕·帕慕克

宗笑飞 林边水 译

好文共赏

季羨林自传(下)

我现在想谈一点关于进行科学研究指导方针的想法。六七十年前胡适先生提出来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认为是不刊之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针。古今中外，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概莫能外。在那一段教条主义猖獗、形而上学飞扬跋扈的时期内，这个方针曾受到多年连续不断的批判。我当时就百思不得其解。试问哪一个学者能离开假设与求证呢？所谓大胆，就是不为过去的先入之见所限，不为权威所囿，能够放开眼光，敞开胸怀，独具只眼，另辟路径，提出自己的假设，甚至胡思乱想，想入非非，亦无不可。如果连这一点胆量都不敢有，那只有循规蹈矩，墨守成法，鼠目寸光，拾人牙慧，个人决不会有创造，学术决不会进步。这一点难道还不明白，还要进行烦琐的论证吗？

总之，我要说，一要假设，二要大胆，缺一不可。

但是，在提倡大胆的假设的同时，必须大力提倡小心的求证。一个人的假

设，决不会一提出来就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有一个随时修改的过程。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经验：在想到一个假设时，自己往往诧为“神来之笔”，是“天才火花”的闪烁，而狂欢不已。可是这一切都并不是完全可靠的。假设能不能成立，完全依靠求证。求证要小心，要客观，决不允许厌烦，更不允许马虎。要从多层次、多角度上来求证，从而考验自己的假设是否正确，或者正确到什么程度，哪一部分正确，哪一部分又不正确。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实事求是，容不得丝毫私心杂念，一以证据为准。证据否定掉的，不管当时显得多么神奇，多么动人，都必须毅然毫不吝惜地加以扬弃。部分不正确的，扬弃部分。全部不正确的，扬弃全部。事关学术良心，决不能含糊。可惜到现在还有某一些人，为了维护自己“奇妙”的假设，不惜歪曲证据，剪裁证据。对自己的假设有用的材料，他就用；没有用的、不利的，他就视而不见，或者见而掩盖。这都是“缺德”（史德也）的行为，我期期以为不可。至于

剽窃别人的看法或者资料，而不加以说明，那是小偷行为，斯下矣。

总之，我要说，一要求证，二要小心，缺一不可。

我刚才讲的“史德”，是借用章学诚的说法。他把“史德”解释成“心术”。我在这里讲的也与“心术”有关，但与章学诚的“心术”又略有所不同。有点引申的意味。我的中心想法是不要骗自己，不要骗读者。做到这一步，是有德。否则就是缺德。写什么东西，自己首先要相信。自己不相信而写出来要读者相信，不是缺德又是什么呢？自己不懂而写出来要读者懂，不是缺德又是什么呢？我这些话决非无中生有，无的放矢。我都有事实根据。我以垂暮之年，写了出来，愿与青年学者们共勉之。

现在再谈一谈关于搜集资料的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必须搜集资料，这是不易之理。但是，搜集资料并没有什么一定之规。最常见的办法是使用卡片，把自己认为有用的资料抄在上面，然后分门别类，加以排比。可这也不是唯一的办法。陈寅恪先生把有关资料用眉批的办法，今天写上一点，明天写上一点，积之既久，资料多到能够写成一篇了，就从眉批移到纸上，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比如，他对《高僧传·鸠摩罗什传》的

眉批，竟比原文还要多几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自己既很少写卡片，也从来不用眉批，而是用比较大张的纸，把材料写上。有时候随便看书，忽然发现有用的材料，往往顺手拿一些手边能拿到的东西，比如通知、请柬、信封、小纸片之类，把材料写上，再分类保存。我看到别人也有这个情况，向达先生有时就把材料写在香烟盒上。用比较大张的纸有一个好处，能把有关材料都写上面，约略等于陈先生的眉批。卡片面积太小，这样做是办不到的。材料抄好以后，要十分认真细心地加以保存，最好分门别类装入纸夹或纸袋。否则，如果一时粗心大意丢上张把小纸片，上面记的可能是最关重要的材料，这样会影响你整篇文章的质量，不得不鼯勉从事。至于搜集资料要巨细无遗，要有竭泽而渔的精神，这是不言自喻的。但是，要达到百分之百的完整的程度，那也是做不到的。不过我们千万要警惕，不能随便搜集到一点资料，就动手写长篇论文。这样写成的文章，其结论之不可靠是显而易见的。与此有联系的就是要注意文献目录。只要与你要写的文章有关的论文和专著的目录，你必须清楚。否则，人家已经有了结论，而你还在卖劲地论证，必然贻笑方家，不可不慎。

我想顺便谈一谈材料有用无用的问题。严格讲起来，天下没有无用的材料，问题是对谁来说，在什么时候说。就是对同一个人，也有个时机问题。大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只要你脑海里有一个问题，一切资料，书本上的、考古发掘的、社会调查的等等，都能对你有用。搜集这样的资料也并不困难，有时候资料简直是自己跃入你的眼中。反之，如果你脑海里没有这个问题，则所有这样的资料对你都是无用的。但是，一个人脑海里思考什么问题，什么时候思考什么问题，有时候自己也掌握不了。一个人一生中不知要思考多少问题。当你思考甲问题时，乙问题的资料对你没有用。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会思考起乙问题来。你可能回忆起以前看书时曾碰到过这方面的资料，现在再想去查找，可就“云深不知处”了。这样的经验我一生不知碰到多少次了，想别人也必然相同。

那么怎么办呢？最好脑海里思考问题，不要单打一，同时要思考几个，而且要念念不忘，永远不让自己的脑子停摆，永远在思考着什么。这样一来，你搜集面就会大得多，漏网之鱼也就少得多。材料当然也就积累得多，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旦用起来，你就左右逢源

了。

最后还要谈一谈时间的利用问题。时间就是生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而且时间是一个常数，对谁都一样，谁每天也不会多出一秒半秒。对我们研究学问的人来说，时间尤其珍贵，更要争分夺秒。但是各人的处境不同，对某些人来说就有一个怎样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的问题。这个怪名词是我杜撰出来的。时间摸不着看不见，但确实是一个整体，哪里会有什么“边角废料”呢？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平常我们做工作，如果一整天没有人和事来干扰，你可以从容濡笔，悠然怡然，再佐以龙井一杯，云烟三支，神情宛如神仙，整个时间都是你的，那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边角废料”问题。但是有多少人能有这种神仙福气呢？鲁钝如不佞者几十年来就做不到。建国以来，我搞了不知多少社会活动，参加了不知多少会，每天不知有多少人来找，心烦意乱，啼笑皆非。回想十年浩劫期间，我成了“不可接触者”，除了蹲牛棚外，在家里也是门可罗雀。《罗摩衍那》译文八巨册就是那时候的产物。难道为了读书写文章就非变成“不可接触者”或者右派不行吗？浩劫一过，我又是门庭若市，而且参加各种各样的会，终日马不停蹄。我

从前读过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和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觉得异常可笑，岂意自己现在就成了那一类人物，岂不大可哀哉！但是，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是能够想出办法来的。现在我既然没有完整的时间，就挖空心思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在会前、会后，甚至在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有不少会，讲话空话废话居多，传递的信息量却不大，态度欠端，话风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这个”、“那个”，间之以“俺”、“啊”，白白浪费精力，效果却是很少。在这时候，我往往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全部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到脑海里，构思，写文章。当然，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自行车上，特别是在步行的时候，我脑海里更是思考不停。这就是我所说的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文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此时我反而期望开会了。这真叫做没有法

子。

我在上面拉杂地写了自己七十年的自传。总起来看，没有大激荡，没有大震动，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我谈的治学经验，也都属于“勤捉”之类，卑之无甚高论。比较有点价值的也许是那些近乎怪话的意见。古人云：“修辞立其诚”。我没有说谎话，只有这一点是可以告慰自己，也算是对得起别人的。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写完

上面的自传是一九八八年写成的，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了。在人生百年中，十年是一个不短的期间。时移世异，人事沧桑，今天的我已经非复当年之我了。现在中央党校出版社要出版我的《牛棚杂忆》，希望能附上我的一篇自传，使读者能了解牛棚里的季羨林究竟是何许人，并且建议就用上面这一篇，再加上点延续，一直写到今天。这个建议是合情合理的，我准备采纳。

但是，仔细一琢磨，却有了困难。上面这一篇是有头有尾的。如果在尾巴砍上一刀，狗尾续狗，难免不伦不类，不像是一篇完整的文章。考虑再三，决定保留上篇的完整性，再补上一个下篇，看上去，同样是完整的。

一九八八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头呢？改革开放的政策已经实行了十年，

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经济繁荣，人民欢乐，知识分子这一个解放后历届政治运动都处在挨整的地位上的社会群体，现在身上的枷锁砸掉了，身心都感到异常的欢悦，精神又振奋了起来，学术界和文艺界真是一派大好形势。我自己当然也感觉到了这种盎然的春意。虽然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是，学校决定我不退休，我感到很光荣，干劲倍增。不似少年，胜似少年，怡怡然忘记了老之已至。我虽然已经没有正式的行政工作，但是社会工作和社会活动，却是有增无减。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我被选为主席、会长或名誉主席、会长的有七八个之多。至于理事之类，数目更多。不顾不问的顾问，一个团体的或一部书的，总有几十上百个，确实数目，只有天老爷知道，我个人是搞不清楚的。大型丛书，上千册的，上百册的，由我担任主编的，也有三四部。至于电视采访，照像录音，也是常事。几乎每天下午都是宾客盈门。每天接到各式各样的来信也多有封。里面的请求千奇百怪。一些僻远省份青年学生的来信，确实给我带来很大的快乐。我从内心里感谢这一些天真无邪的青年男女学生对我的信任。一位著名的作家，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我，说我每信必覆。这却给我带来了灾难。

我哪里能做到每信必覆呢？即使我什么事情都不干，也是做不到的。我只能让我的助手和学生代覆，这难免给一些男女大孩子带来了失望。我内疚于心，然而却无能为力。

我写这些事情干什么呢？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告诉读者我现在生活和工作的真实的情况；如果我有不周到的地方，请他们体贴原谅。

在学术工作方面，有人说，我自己太残酷。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虽然大体上说来，我的身体还算是硬朗的，但是眼睛和耳朵都已不太灵光，走路有点“飘”；可我仍然是不明即起，亮起了朗润园里的第一盏灯，伏案读写，孜孜不倦。难道我不知道，到圆明园或颐和园去溜弯，再远一点，到香山去爬山，不比现在这样更轻松愉快吗？难道我在名利方面还有什么野心吗？都不是的。我知道溜弯舒服；但我认为人活着不是为了多溜几年弯。那不是追求的目的。至于名利，我现在不虞之誉纷至沓来；利的方面，爬格子爬出了点名堂，稿费也是纷至沓来。可以说，在名利两个方面我都够用了，再多了，反而会成为累赘。那么，我这样干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我不愿说谎话，讲些为国为民的大道理。我只能说，这样做能使自己

心里平静。如果有一天我没能读写文章，清夜自思，便感内疚，认为是白白浪费一天。习惯成自然，工作对我来说已经成了痼疾，想要改正，只有等待来生了。

计算一下，最近几年来，我每年写的文章，数目远远超过过去的任何一年。我平生最长最艰巨的两部书，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一部是长达80万字的《糖史》，一部是也长达数十万字（因为部分用英文写成的，字数难以准确统计）的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我虽然是个杂家，但是杂中还是有重点的。可惜，由于一些原因，不明真相的人往往不明白我干的究竟是哪一行。外面来的信，有的寄到中文系，有的寄到历史系，有的寄到哲学系，有的寄到西语系，有的甚至寄到社会学系。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我的了解。两部大书一出，估计可以减少点混乱。对我来说，这种混乱一点影响也没有的。

以上是我最近十年来生活的综述，也可以算是“自传”吧。

在这期间，我是怎样考虑十年浩劫的呢？实际上，从我脑筋开了窍认识到这一场在极端绚丽的面纱下蒙着的极端残酷的悲剧那一天起，我就没有把它忘记。但是，我期待着，期待着，一直到一九九二年《牛棚杂忆》产生，我的期待结束。到了今年一九九八年，《牛棚杂忆》终于出版问世。我的心情才比较得到了点宁静。这一切我已经在“自序”中比较详尽地介绍了，这里不再重复。我觉得，我总算为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做了一件好事。我又有了新的期待，我期待还能有问津者。

作者：季羨林

来源：新华网

■ 史苑钩沉

北大无北门

“同学你好，北门怎么走？”
“不好意思，北大没有北门呀。” 北京大学有很多门——东门外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西门上的飞檐和斗拱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永远有游人往来拍照；南门距宿舍区最近，每天都有无数抱着快递盒子的学生从这道门进进出出。唯独缺了北门。

北大的最北端是一堵青灰色的弧形围墙，西起蔚秀园，经鸣鹤园到朗润园，将整个北大北面的水木清华小心翼翼地包围起来。爬上土坡趴在北墙上探头，可以清楚地看见圆明园地铁站的出口，以及只有一街之隔的圆明园。北大为什么没有北门？想回答这个问题，时光要倒流回上世纪初的燕京大学。

1920年，司徒雷登转遍了北京四郊，只为了给刚刚接手的燕京大学挑一个新校区。几经周折，他最终挑选了离颐和园不远的一块地方，那里横跨已经荒芜颓废的前清皇家园林淑春园和畅春园。司徒雷登从陕西督军陈树藩的手中购得

了这块地皮，燕京大学最初就是在勺园和淑春园两座古园林遗址上建立起来的。

淑春园曾经是圆明园的属园，它和北大校园北面的鸣鹤园、镜春园、朗润园、蔚秀园、承泽园等园林一样，都是皇帝赏给宠臣和贵族的赐园。和珅接手淑春园后大肆营建，将其打造的富丽堂皇，花团锦簇，号称是“京师第一名园”，有诗曾赞美此园道：“缤纷珂繖驰中禁，壮丽楼台拟上林”。只可惜美丽繁华都只是昙花一现。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了圆明园，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直到民国初年，淑春园一直破败不堪，园内建筑所剩无几。所以，到了司徒雷登手中，一切得重新开始。

燕京大学早期地图 建校心切的司徒雷登请来了耶鲁大学毕业的墨菲作为校园建设的总设计师。在古典造园与现代建筑设计相结合的理念下，燕京大学的主轴线以贝公楼定位，跨石桥，穿西门，直指京西玉泉山顶，从而使未名湖



畔的博雅水塔与玉泉山上的玉泉塔遥遥相望。墨菲甚至深谙明朝米万钟经营勺园时“更喜高楼明月夜，悠悠把酒对西山”的浪漫，一反北京坐北朝南的传统，将燕京大学主校门和主教学楼朝西布置。由于墨菲在规划的最初就是以园林保护为核心理念，所以燕大的北面园林得以继续水木清华，诗情画意。

那么北大现今的北墙到底是何时建成的？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朗润园和鸣鹤园。

朗润园原名春和园，北面与圆明园只有一墙之隔，东临城府街，南隔镜春园遗址与未名湖相望，西接鸣鹤园遗址，整体上呈东西长方形，西北一隅为弧形墙。朗润园是圆明园的附属园林之一，直到民国初年仍归皇室所有。1923年，燕京大学在淑春园故址建校后不久便与朗润园主人签订了为期三十年的租赁合同，将其作为教职工住宅。

朗润园曾经有东西两门，正门在东南角，对着今成府街西口；西门对着石平桥，北面围墙并无出口。燕京大学建设时期，木器厂的建设毁坏了朗润园东南门，此后西门也不复存在。鸣鹤园也是圆明园的附属园林，与朗润园一样，正门同样在全园的东南角，南墙西端还

有院门一座，名为丽春门，北墙并无出口。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院长邓辉教授解释道，北大北门历史上就没有存在过，按照中国传统的解释，北边是聚气之地，向北边开门实际上不符合风水的观念。

简单来说，北大的北墙就是朗润园、蔚秀园和鸣鹤园这三座清朝皇家园林的围墙，本来便没有门。那为何北大迁入后，没有在北墙开门呢？

1952年燕大和北大合并后，北大购得承泽园，镜春园，朗润园，完成了以古园林为基础的的一次空间扩张，这些园林主要用于兴建教师公寓。当时，未名湖区域规划用地已基本建设完成，校园北部为圆明园遗址，西部以西校门为界，所以规划者建议在原燕园内不塞入新房子，而要往东往南寻求空间。从地形的角度看，燕园的东部和南部地势高，而西部和北部地势较低，中间有4米高的水平落差。历史上燕园西部低地有着非常丰富的地下水溢出地上，引水造园十分方便，蔚秀园、承泽园、畅春园、鸣鹤园、镜春园等重要园林都聚集在低地。

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学校西部地区是大面积的稻田，就连学校西门内也存在自流喷泉，可见地下水位仍然

极高。在这种地质条件下进行校舍建设，需要增加很多额外的开支，且市政府规划部门对学校西部地区建设也有建筑高度的限制。所以，校园建设规划确立了东西兼顾，重点是向东发展的方向。现在，北大的校园规划分区设计中，南部为学生宿舍区，东部为教职工宿舍区，未名湖以南居中为教学区，园林遗产则位于校园的北部。这一功能分区十分有利于遗产的保护，回复园林风貌，为园林化的北大校园奠定了极好的基础。除了地形和园林保护的考虑外，现实情况中北门存在的必要性确实也不大。北墙外和圆明园地铁站之间，一条名为万泉河的小水渠穿行而过，即使有北门，想必出行也并不方便。

有人说，北大有个北门。

传说中，北大曾经有一个“曾经开过但后来被封的”小北门。散步在新外院楼西面的小路上，可以看到那个废弃的铁门，被已经生锈的铁链缠绕封锁。一个从小生活在北大的师傅说，那不是给行人走的地方，那是建设新外院楼时，为了方便运送建筑材料而开的小北门，外院楼建成后，这个小门也就退休了。

北大的北面没有门，只有静默的北

墙和掩映着的山水园林，荒芜中透露着沉醉迷人的美。偶尔有几个胡子花白的推着自行车的老伯缓缓经过，时间的流逝在这里似乎变慢。风风火火的年轻学子来到这里，也会情不自禁地被感染而放慢脚步。

几十年来，有多少人曾经想探索北大的秘密，沿北墙踱步一周，趴在墙上远眺，只为了寻找那个不存在的北门？他们中，有93级法律系的诗人错河。为了提醒后来者要对思维及语言体系进行超越，他为自己构造了一个“神话”：从北大门口进入，而没有从门口出来。于是，他用一根仿军用背带从宿舍朝北的窗子顺绳而下，而后踉跄着走到北墙企图翻墙而过。可是绳子断了，他加速坠落。躺在医院里，他仍然坚持：“北大有个北门。”

来源：北大青年

作者：李佳璇 国际关系学院 2015
级本科生周颖 社会学系 2015 级硕士研
究生

■ 大美北大

樱 花

樱花，（学名：*Cerasus sp.*），是蔷薇科樱属几种植物的统称，在《中国植物志》新修订的名称中专指“东京樱花”，亦称“日本樱花”。樱花品种相当繁多，数目超过 300 种以上，全世界共有野生樱花约 150 种，中国有 50 多种。全世界约 40 种樱花类植物野生种祖先中，原产于中国的有 33 种。其余则是通过园艺杂交所衍生得到的品种。



樱花原产北半球温带环喜马拉雅山地区，在世界各地都有生长，主要在日本国生长。花每枝 3 到 5 朵，成伞状花序，花瓣先端缺刻，花色多为白色、粉红色。花常于 3 月与叶同放或叶后开花，

随季节变化，樱花花色幽香艳丽，常用于园林观赏。樱花可分单瓣和复瓣两类，单瓣类能开花结果，复瓣类多半不结果。



据文献资料考证，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樱花已在中国宫苑内栽培。唐朝时樱花已普遍出现在私家庭院。当时万国来朝，日本国朝拜者将樱花带回了东瀛，其在日本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樱花象征热烈、纯洁、高尚，被尊为日本国国花。

摄影：靳戈 姜南

编辑：未天

■ 学员心声

感谢有你

----赠国培

感谢有你

用理论联系实际的视频学习
把我从陈旧的教学迷途中拉起
不离不弃

感谢有你

用两个半月的靓丽
把迷失的灵魂唤醒
神奇无比

感谢有你

搭建了一片富饶的网络平台
天南海北 教育同行 互动交流 出谋划策
校园才会如此这般美丽

感谢有你

无数次的言语教化
只为我的观念更新 回心转意
感动了我 也感动了你

枯燥寂寞有什么了不起
我的精神家园在这里
透过你深邃的眼睛
我看到了支撑教育的根基

感谢有你
专家点评 解惑答疑
复苏了无数的观念
解读着教育的真谛

感谢有你
传播教育理念 应用教育实际
你用人格的魅力
诠释着教育的意义

教书和育人没有差异
只要有 you
即使被曲解
也阻挡不了不变的真理

一路走来 感谢有你
跌倒了再爬起
指引着我的是你还是你
我愿和你相约在下一个冬季

作者：郑玉荣
河南省刘河镇刘河初中